



中评周刊 | 第 78 期目录

专题 | 开学第一课：让权力离孩子远点

1. C 计划团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开学第一课 P. 2
2. 张思谦：充满仪式感的德国小学开学日 P. 8
3. wanghuolo bw6hw：北京小学生的瑞士生活——瑞士上学 P. 12
4. 茅于軾：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P. 16
5. 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行政部门对教育资源的配置公正吗？ P. 19
6. 陈远：民国教育的两翼格局：权力靠边站 P. 26

观点文章

1. 荣剑：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 [中] P. 36
2. 周其仁：改革的逻辑 P. 48

随笔散记

1. 盛洪：“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 P. 52
2. 范晔：在群情汹涌的狂热时刻，谁有勇气说不 P. 56
3. 傅国涌：教育就是与美相遇——重温民国中小学教育 P. 60

读书

何光沪：为李勇“花开见佛”而作 P. 67

预告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70

订阅 | 往期下载 P. 72

C 计划团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开学第一课

[本文首发于微信号“C 计划”，编辑：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昨晚，你带着孩子看《开学第一课》了么？

这是教育部的强制要求，估计你也不得不看，还看了至少 13 分钟广告。今年《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创造向未来”，用教育部文件的原话，这是为了“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鼓励创新创造，弘扬科学精神，倡导创新文化”。

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自然很重要。但如果我们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并不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或者说批判性思维能力，那也很难培养真正的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

因为批判性思维，乃是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基础。它意味着质疑意识，重视证据，要求人们考虑多元意见，保持独立和自由的思考。

刚过去的八月，我们和博雅小学堂合作，在北京带着 16 个 10 到 14 岁的孩子做了两天批判性思维工作坊。在这个过程中，我既看到了孩子们自由的思想碰撞出的火花，也看到一些思维的局限，更感受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



质疑的意识

批判性思维，也就是独立思考能力，它的基础，是质疑的意识。这意味着人们要勇于挑战权威、寻求真相，对复杂问题保持好奇心和耐心。

要形成质疑意识，需要先分清事实和观点。如果人们把某一个观点误以为是准确无误的事实，误以为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也就谈不上质疑。

在区分事实和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尽量用事实说话，基于事实发表观点；并对缺乏事实支撑的观点保持合理质疑。例如，“应该想办法把北京的人口减少一些”。

在学习了事实和观点的区别之后，工作坊中的孩子普遍能识别出这是观点。不过，很多小朋友都认可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北京交通拥堵，地铁里人多。这都是孩子们能直观感受到的，能想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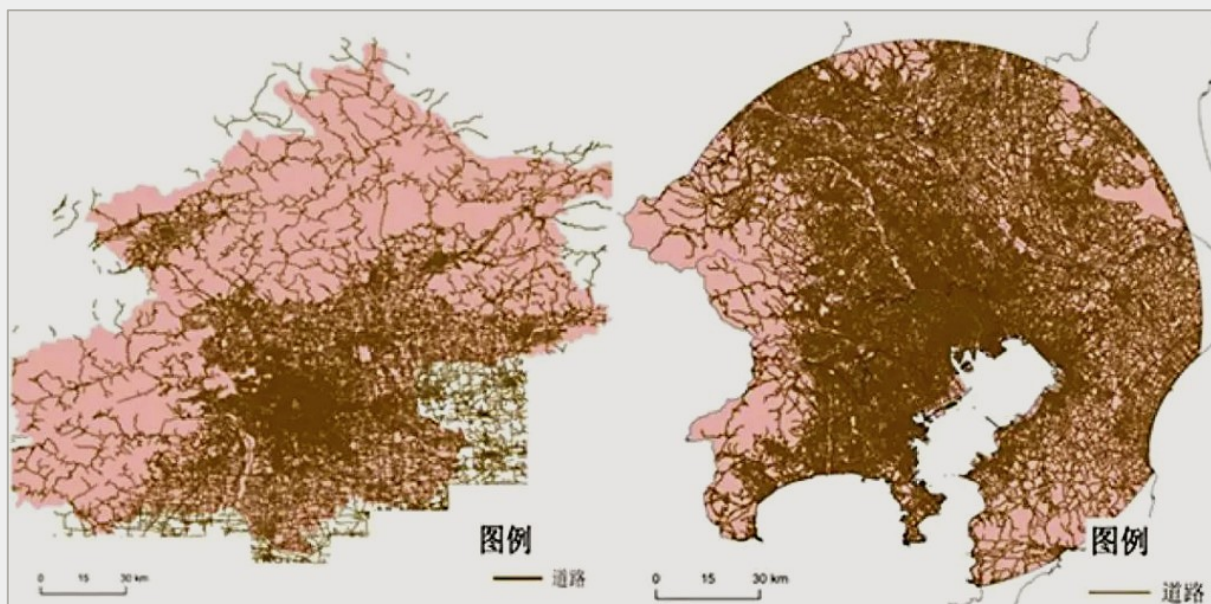
但是，交通拥堵和地铁人多能直接推出我们就应减少人口吗？有没有可能问题不在于人多，而在于道路规划和公共交通供应的问题呢？

可以把北京和东京做个对比。

从人口数量来看，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大东京圈人口近3800万，北京人口2170万。东京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是北京的1.68倍，整个大都市圈的人口密度是北京的2.2倍[1]。

从拥堵情况来看，北京比东京更拥堵。日本国土交通省资料显示，在整个东京大都市圈内，从单程通勤时间来看，96%的居民在2小时以内，77%的居民在1.5小时之内[2]。

从道路设计来看，北京的道路宽而短，东京的道路细而长。北京道路的面积是东京的二倍，但长度却只有东京的1/4。这样的道路设计更容易造成拥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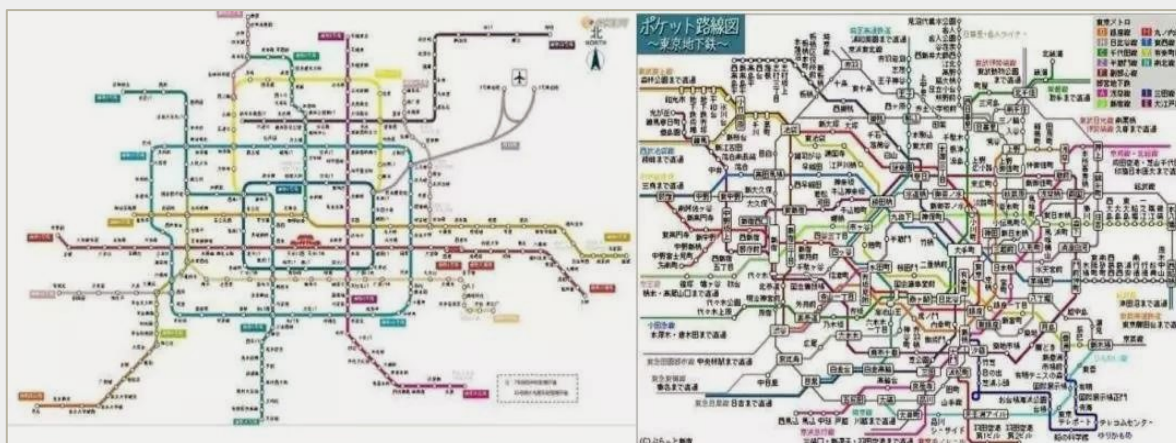


左图为北京道路，右图为东京道路

从公共交通来看，东京有铁路、有轨电车和地铁，承载了整个都市圈内旅客运输量的86.5%。轨道交通站点的数量是北京的4倍。而且北京公交也存在大量重复的线路，规划并不合理[2]。

总的来说，要想解决北京的拥堵问题，更合理的交通管理、更充分的公交服务，可能都是比直接减

少人口更好的方式。而减少人口，甚至运用一些极端手段驱逐人口，很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应该想办法把北京的人口减少一些”，这本身就是个值得质疑的观点。



左图为北京地铁路线图，右图为东京地铁路线图

对于 10 到 14 岁的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社会现象，其实早已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但只有保有质疑的意识，孩子们才会更深入的去思考和研究这些复杂问题。当他们也开始参与公共生活时，才有可能用创造性的方式真正解决问题。

而质疑的意识，也将是他们接下来进行学术学习甚至从事科学研究的必须。勤于提问和思考，才敢于挑战现有的研究，警惕其中的偏见，提出独立的洞见。

多元的意见

批判性思维要求人们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并平等对待不同角度的观点，避免自我中心或盲目从众。

我们在工作坊里，和孩子们一起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学校要开一个重点班，把最优秀的老师放在这个班级，应该用什么标准来选学生？

当我们让孩子们尽可能多的想一些选择标准，孩子们想到各种各样的筛选标准真是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但当讨论起什么是最合理的标准，有不少孩子认为是：选成绩好的学生。因为重点班的目的是为了拔尖，给学习最好的孩子匹配最优秀的老师，能让他们更加优秀。

现实中，很多学校的重点班就是这么做的。

但这是最好的方案吗？这是一个公平合理的方案吗？有没有不同角度的观点应该被考虑呢？

例如，是否应该让成绩最差的孩子进到这个班级呢？他们可能更需要更优秀的老师，帮助他们提升成绩。

是否应该让那些最弱势的学生进入这个班级呢？他们的家庭没有办法给他们更优质的学习资源、生活环境，如果有最优秀的老师的帮助，这些孩子会有完全不同的未来。

对很多城市地区的学生而言，他们很难想象自己所在阶层和环境之外的生活——那些“弱势学生”

的条件究竟可以糟糕到什么程度？

我们在工作坊中，也给孩子们播放了一些体现阶层差异、贫富分化的纪录片。当学生们了解到那些身陷贫困的同龄人每天过着怎样的生活，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能接受到的教育资源何等匮乏时，他们开始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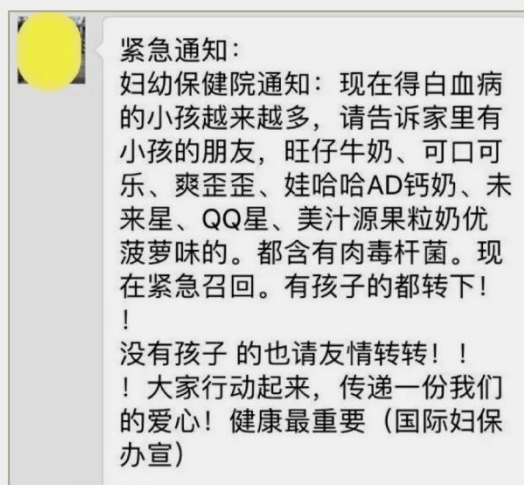
在接下来的争论中，有的学生表现出更强的同理心，他们认为优质资源应向这些弱势群体倾斜分配；有的学生则更相信优胜劣汰，每个人要用实力争取最优质的资源，而成绩是体现实力最好的方式。也是在这样的碰撞中，学生们才可能逐步建立自己独立的价值观。

而这，对于成就独立的人格至关重要。

重视证据

批判性思维要求人们重视证据，依靠证据得出结论，而不应该轻信传言，或者过度依赖没有证据支持的主观观念。

我们在工作坊中，也给孩子们展示了一则家庭微信群里常见的信息：



如果这是你妈妈转发的，你应该相信吗？

当孩子们在工作坊中学习了辨别信息真伪的方法，他们能有意识的检查信息源，更快捷的在网上查找证据，很快就发现上面是一则虚假消息。

除了养成在日常生活中不轻信网络传言的基本素养，我们也在工作坊中设计了一些科学实验。例如在水中加入糖或盐，是否会导致水温的变化？怎么通过实验来验证呢？更进一步，水的温度本来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那怎么知道这种变化是不是由糖或盐导致的呢？孩子们由此学习了要在实验中设计对照组。在一轮轮的实验中，孩子们要自己记录实验的数据，作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结论。

让学生们理解证据的意义和价值，区分证据质量的好坏，这是学术研究的核心。而它对创新也至关重要。现在社会中的一些“创新”，可能“为了新而新”，只注重形式，却没有关注创新带来了什么改变，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背后的证据究竟是什么。



思想的自由

在整场工作坊中，孩子们也展现出非常多思维的亮点，有时候几轮提问过后，孩子们思考得更有深度了。

例如，我们一起讨论绘本中对“好人”和“坏人”的界定。有的孩子会跳出常规，意识到“坏人”可能是因为他们成长中的局限性、受到社会的影响，导致了不好的决策和行为，未必真的那么坏。

我们也讨论了经典的哲学思想实验“电车困境”：设想一辆疾驰而来的电车，眼看就要撞上正在修铁轨的五个人，但是如果转向，就会撞到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人。如果你是电车司机，你会转向还是继续行驶？

一些小朋友们的反应，一开始是始终拒绝进入这样的道德难题，找到大量破绽去挑战这一困境，这也是很好的质疑。

不得不做出选择时，两种观点都有孩子支持，也都提出很多挺好的理由。有的孩子认为，如果司机什么都不做，就不需要为撞死的五个人负责，但如果主动转向，就需要为因为转向而被撞死的一个人负责。另一些孩子则认为五个人比一个人的数量多，还是应该转向。

当我们进一步限定条件——如果另一条轨道上的一个人是你认识的亲人或朋友，你会转向还是继续行驶？

孩子们“非常规”的回答也让我们非常吃惊。一位小朋友说，他会选择让火车装箱自己的亲人或朋友——因为“另一条轨道的五个人也是别人的亲人或朋友”。

很多孩子说，在课堂和家庭中，他们往往被告知“标准答案”；被告知，甚至被命令“应该怎么做”。更多时候，很多老师和家长们并没有给孩子们提供理由，也没有让孩子们充分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



而我们认为一个大原则，应该是充分保护孩子们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他们会被不断追问，但绝不会被禁止发言或因为某个观点受到批评。这样的工作坊，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闹腾”。

有时学生们散落在教室各处看视频，有的直接坐在讲台边；角色扮演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入戏的排练、表演；表达观点的时候，辩论起来声贝越来越高，倒也都说的有理有据；做科学实验时，一边认真测量，一边讨论背后的道理；想发言的时候，不一定都要举手，示意老师一下就可以直接发言，如果几个人都抢着说，总能弄出个先后顺序。

这样闹腾的表象之下，是孩子们的投入和开心，是对每个环节的深度参与。不少孩子们跟家长说，“这样的课为什么不能再多上几天？”

这样的思想自由，对于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它保证了人们不会为了服从权力或权威而扭曲真相，而限制自己的潜力和创造力。

我期望的开学第一课，能肯定质疑的意识，重视多元的意见，关注证据，保证思想的自由。我期望这样的课，不止是第一课，而成为每一课，成为教育的核心。

参考资料：

1.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7，《图解七座国际都市② | 人口密度：北京居中，首尔建成区人最密》（编译自《首尔与世界大都市：千禧年之后的城市变化比较》），澎湃新闻

2. 李燕&王芳，2017，《北京的人口、交通和土地利用发展战略：基于东京都市圈的比较分析》，《经济地理》，第4期

[【返回目录】](#)

张思谦：充满仪式感的德国小学开学日

[张思谦 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 (Karlsruher Institut für Technologie) 国民经济学硕士, 本文转载自2018年8月《上海教育-环球教育时讯》杂志, 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 转载请注明]

在德国, 小学开学这一天, 在路上就能看到不少抱着入学喇叭筒的小新生, 喇叭筒几乎没有重样的, 看得出来很多都是手工制作的, 非常漂亮, 孩子们捧在手中, 脸上也是神采奕奕。



在德国, 小学一年级新生进入校园第一天, 父母们提前为孩子们备好装满新奇玩具、文具、小故事书和各种糖果的“入学冰激凌桶”, 为孩子们走进校园第一天带来欢乐和自豪

特特今年上小学, 和预期中的一样, 他被划分在离家最近的公立学校。对于开学第一天的日子, 我并没有特意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所以也就没有为特特准备太多。是德国人认为孩子上小学的第一天与众不同, 仪式感甚至堪比婚礼。特特好朋友的妈妈安妮特告诉我, 小学开学日是德国人非常看重的日子, 那一天人们还会准备一个大大的入学喇叭筒 (Schultüte), 将亲朋好友送来的很多礼物装在里面。

开学这一天, 我们在路上就能看到不少抱着入学喇叭筒的小新生, 喇叭筒几乎没有重样的, 看得出来很多都是手工制作的, 非常漂亮, 孩子们捧在手中, 脸上也是神采奕奕。每个孩子后面则尾随着他的父母、弟弟妹妹, 还有爷爷奶奶等长辈, 浩浩荡荡的一大堆人。

一对比, 我就发现我们太不正式了: 首先没有给米拉准备小型的喇叭筒, 导致米拉就空着手跟在我们后面, 而别家的弟弟妹妹都拿着小号的入学喇叭筒, 里面装满了糖和小礼物, 一点儿没有落单的

感觉。其次，由于前一夜儿子睡觉踢被子着凉了，早上起来觉得冷，我便给他多套了几件衣服，看起来比较随意，像是要去踢球一样，而其他的孩子就普遍穿得比较正式，小男孩多为小衬衫或是有领子的短袖，女孩们则以裙装为主。



德国小学入校新生得到家长的“入学冰激凌桶”礼物，这一传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



德国小学生入学第一天的仪式，通常在吉他声和神父低沉的男中音响起时，全场父母为孩子们发自内心地歌唱，很多人会感动得落泪，仪式的最后神父或牧师会亲自为每一个孩子送上祝福

开学典礼的第一部分是在教堂做礼拜 (Gottesdienst)。天主教的神父和基督教的牧师同时出现在了教堂，当神父开口说话的时候现场立刻就自动安静了下来。他说得很慢，诚意满满。面对坐在头两排的抱着入学喇叭筒的小新生们，他弯下腰说：“今天很荣幸在这里见到你们，欢迎你们。你们都在这里，真好！”在教堂里举行的这个活动的全称叫做“入学礼拜仪式” (Einschulungsgottesdienst)，它在德国的意义不亚于平安夜。德国家庭里有小孩要进入小学时，往往整个家庭都会积极参与庆祝。而“入学礼拜”的意义在于，通过这个仪式，带领孩子告别幼儿园，并正式引导孩子进入下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小学。

教堂的气氛很庄严，高高的屋顶让人觉得无比隆重，孩子们抱着入学喇叭筒坐在最前排，接受来自所有人的祝福。没有欢快的儿童歌曲，没有夸张的蹦蹦跳跳，没有人刻意地维持全场纪律，神父和牧师主持全场，用最简单的乐器伴奏，父母们跟着合唱，为孩子们送上祝福。唱歌的内容也没有豪言壮语，而是以成人和耶稣信徒的语气对进入小学的孩子说：

“真好，你到这里来了……”

“我喜欢你，因为你真的很棒……”

“我需要你，因为我无法一人做到这些……”

“谢谢你，愿意分担我的忧愁……”

“来吧，我们同行，一起生活会很有意义……”。

吉他声和神父低沉的男中音响起时，全场父母为孩子们发自内心地歌唱，好多人感动得落泪。在礼拜仪式的最后，父母们撑起了一个帷幕，神父和牧师坐在帷幕下，亲自为每一个孩子送上祝福。

开学典礼的第二个部分是回到学校分班。二年级的学生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几个小节目。他们的表演既没有统一着装，也没有盛大的排场，但是特别温馨，所有人都簇拥在大厅里，就像一家人一样。更让人惊喜的是，旁边还有幼儿园的小弟弟小妹妹，他们被老师带来给小学新生们助威。

之后，校长给孩子们讲了个关于开学的小故事。随后孩子们就被各班的老师带进了教室，上了第一堂课，但这节课只是让孩子们感受一下班级的氛围。在孩子们上课的时候，大人们就在校园里吃点心、喝咖啡，在校园内走走看看。

第二天送特特去上学的时候，我见到了更难忘的一幕。只见高年级（四年级）的孩子们跑出了教室来到校门口，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家两两相对地站成两排，从学校教学楼的正门沿着石子路蜿蜒到一年级的班级门前。这些面对面站着的孩子们互相撑起双手，形成一个个小拱门。

随后音乐声响起，校长说：“让我们以我们的形式欢迎一年级新生。”伴随着音乐，优美的歌声传来，这首歌叫做《你属于我们》(Du gehörst zu uns)，歌词非常感人：“今天是你第一天在我们这里……我也曾经有过不适的感觉，尤其是在陌生的环境，认识的人也不多的时候，但是明天，你再来到这里，就会发现有些不同，而且很快你就会发现，我们会变得很熟。我们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你会在这里

找到朋友，所以别只站在门外……”



放暑假前一天，克拉格小学的学生协助包装了 2000 多个大米砂锅套餐——抗饥饿食品
为了帮助饥饿的人们，这些套餐可提供 12,119 顿饭、每顿饭费用为 0.27 美元



这项活动由德国曼彻斯特高中俱乐部提供赞助，参与服务的小志愿者们表现热情而认真

于是，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小新生们跟着自己的主班老师，弯腰穿过高年级孩子们搭起的小拱门，被护送到了自己的班级跟前。整个过程也就五分钟左右，音乐响起时老师和家长们跟着节奏拍手，小新生们兴奋极了，而有些家长则感动得悄悄擦眼泪。

在那一刻，我想到时光飞逝，孩子一下子就长这么大了，他在这充满仪式感的形式中，郑重地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德国人说，重要的人生阶段需要重要的仪式，让人更容易过渡。而成为一个小学生，正是这样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生时刻。 🍷

[【返回目录】](#)

wanghuolo_bw6hw：北京小学生的瑞士生活——瑞士上学

[本文首发于 2008-12-21 作者博客。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瑞士巴塞尔一家小学开学日，
孩子们在家长的注视下，好奇、兴奋或忐忑地张望着他们即将进入的新世界

图片来源：Keystone

今天看见网友的《北京孩子上学难》一文，甚是感慨，于是就想写写我家的北京小学生。

我家小雨是 2000 年出生的跨世纪的孩子，那年的孩子之多是有目共睹的。

她在国内的‘某试验小学’上了一年的学前班，每天 3 顿饭，每月 750 元生活费。准备继续在那上小学（户口不在片内，上学前班的就能优先录取，否则很难排上）。

05 年的赞助费是 2 万，为了孩子，也能接受。可没成想，06 年的赞助费涨到 3 万，真是水涨船高！

我们的工资也没一年涨一万！真是宰你没商量！

我家楼下有一所小学。属划片内学校，无需赞助费。学校不大，有个很小的水泥操场，有一栋 3 层的教学楼，可附近的孩子在这上学的并不多，家庭条件好些和有关系的家长几乎都不把孩子放在此校，说此校就读的大多是卖菜的外来工的孩子，而且教学质量似乎并不好，他们宁愿上远点的学校也不愿耽误了孩子的前途。我想还是先面试，把名报上再看。

报名那天，校长亲自面试，笑容和蔼可亲，她很简单的问了孩子几个问题，面试就通过了。接下来

马上交 350 块钱 (校服和杂费), 而且必须当时交。交, 就意味必须在这上, 可我的确还没下定最后的决心。看我真犹豫, 刚才还和善的校长立马拉长了脸冷言道: “你们要是不想在这上, 就趁早到别的学校去, 别占我们名额!”

一边的两个老师说话了: “要在我们这上, 就交钱。不上就别占名额, 要知道, 收一个管片内的孩子, 就意味着我们少收一个务工子弟, 他们可是要交赞助费的! ”

她们的态度马上就变了, 很是不耐烦, 刚才还仪表端庄的, 这会怎么看都像街上的大妈!

唉, 当时的心情别提多难受了, 真是又委屈又生气!

我拉起孩子就走, 还就不上了! 老师和校长的素质都这么差, 怎能教育孩子!

老公的公司倒是有子弟学校, 甚远, 要住校。从一年级到高中, 环境条件倒是不错。一学期 7500 块, 也不便宜! 可要不是子弟, 还要交 2 万赞助费。相比而言, 我们如果上了, 就等于省了 2 万, 而且还省了孩子起早贪黑, 省了接送, 省了心。就先报了名而且面试和考试也通过了, 就等 9 月开学了。

只是, 一个一年级的孩子, 每年上学就要 15000 块, 比个大学生还多, 投入太多了吧? 还真有些不甘心!

如今的学校怎么都变了味?

正当我们为孩子四处寻找学校的时候, 老公被派往瑞士工作。

是否要让小雨到那上学, 我依然拿不定主意。

思前想后, 决定让老公先去那实地考察再说吧。

经过一个月的考察, 老公来电: 上学和生活都没有问题。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考虑再多也有得失, 还是决定带孩子走, 不管将来怎样, 先让她体会一下国外的学习生活。

我们选的是一所公立法语学校。每年的 8 月中旬开学。

学校不大, 完全敞开式, 没有围墙, 没有大门, 更没有学校的牌子。户外: 一个小停车场, 一个篮球场, 一个足球场, 一个跳远和铅球的沙池及幼儿园的娱乐设施和场地; 教学楼就两层楼, 主楼是幼儿园----9 年級的教室, 图书室。室内走廊很宽大敞亮, 每 2 间教室旁就有一个男女及残疾人厕所, 女厕内有 2 个马桶, 一个面池, 手纸和卫生袋总是不会缺的, 教室外边都有几组可坐式衣帽架, 上学来时把外衣, 伞挂上, 外鞋换成拖鞋, 才可进教室。侧楼 2 层高, 一楼有餐厅, 食堂, 一间大的音乐教室兼礼堂放映室, 但很简单。二楼是教教室。主楼与侧楼有玻璃走廊连接。

总的感觉是: 学校的硬件没有国内的好学校先进和齐全。很简朴。

第一天报到, 本以为人很多, 不想整个一年级就一个班, 19 个学生, 瑞士 7 人, 其余均为世界各地的学生。

老师是一位女性, 穿得怪怪的 (不像国内的正式), 但很和气。她会法语, 德语, 英语, 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会弹钢琴。负责教：数学，法语，手工，自然，音乐。可以说，除去体育，其他科都归她教。

教室在一层，挺大的，矮矮的课桌很合适（高度象咱幼儿园的座椅），前面没有讲台，老师的桌椅和学生的一样高矮，平时老师就坐在那讲课，和学生保持平视；黑板是可上下移动也可翻页的。教室里有面盆，凉水是可饮用水，学生自备牙具，午饭后要求刷牙。孩子随便坐，家长站着听老师简单的介绍，鉴于学生法语程度不同，要将这 19 个孩子在周一和周四分为两组学法语，需要家长选时间。我们根据自己的时间选了周一下午，也就意味：小雨在开学的第一天的下午就要在学校多呆 2 小时。选完时间，家长就可以撤退了（前后半个小时），再有问题请电话联系老师解答。小雨可是一点点的法语都不会呀，中午还要在那吃饭，她能行吗？真让人担心！



每年 8 月中下旬，瑞士各州近 50 万名的小学生便背着书包陆续返回学校，
他们当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瑞士国籍

下午 14.20 放学，我 14.10 分到校接她，偌大的学校竟没见到一个家长，我有些慌乱，还以为记错了时间（国内校门口提前半个小时就有家长站着等了）。直到 14.20 才有家长来接，他们可是真不着急。

小雨的第一天是快乐的，虽然她什么都没听懂。

一年级所学内容为国内大班程度，很浅，一周就留一次家庭作业，作业量很少，主要是娱乐。

6 或 7 岁为上学年龄。小雨上一年级，虽不会法语，但也不用上语言班。因为学校免费为他们班 3 个不会法语的孩子每周专门抽出一节课补习法语，直到认为你交流及听课没有问题为止（小雨免费学了 2 年）。

每年 2 月，3 月，10 月，12 月各有 15 天假期，6 月---8 月有 45---48 天假期，再加上当地还有

名目繁多的假日，一年到头没几天在上课。

如今她在这个学校已经上到三年级了，交了不少朋友。感到很开心。

下面说说瑞士公立小学的费用：

一年 28 瑞郎的保险。(必上)

一周 3--4 顿午餐，每餐 7 瑞郎：披萨；意大利面；鱼排；鸡排。。。水和面包免费。饭很简单，量不大，但孩子爱吃。(可自带饭，但学校不提供热饭)

每年 10 月----次年 3 月为滑冰期，有需要就可以租用学校的冰鞋，20 瑞郎/双。

鞋子租回家，可以随使用。(自己家有，就不必租)

体育课会去冰场滑冰(平均每周一次)，所坐有轨电火车和汽车的车费自理，花 24 瑞郎可坐 12 次，足够孩子这半年使用(滑冰免费)

每年一次郊游，(坐汽车，有轨电火车，火车，轮渡去玩)约 25 瑞郎。

每年 11 月苹果季节，交 25 瑞郎可每天 10 点吃到 1 个苹果，为期 20 天。(自愿)

学校每年都有课外课，你可以自选。学笛子，学烹饪，费用一年最贵就 300 瑞郎(自愿)。

还有音乐班，垒球班，体育班(免费)。

每个孩子可自选学校指定的一所牙科诊所，每学期大约检查 1 次，(免费检查，但有问题就要收费了)。

每年在学校看 5 场电影，共 10 瑞郎。你家孩子越多越便宜。(自愿)

小雨三年级时报了德语补习班(共 6 个学生)，每周一次课，一年 256 瑞郎(自愿)。

除去这些，好像没有其他要交的钱了。

瑞士的义务教育真的是义务：一二年级课本不过是老师复印的一页页纸，用时发给学生，作业也是复印纸。一年下来是厚厚的一摞装订起来的纸。三年级会有书本(免费)。

铅笔，彩色铅笔，橡皮，转笔刀，还有字母本，都会在开学的时候发给你。

三年级多了德语课，所用的书也是上一年级留下的，要求不要涂写，要爱惜，还要留给以后的三年级用。所用的钢笔是发的，钢笔水在老师那，随用随拿。(钢笔水不同于国内，是密闭的一小管，用时往钢笔肚子那一插就好)。.....

大家可以算算，瑞士的义务教育，小学一年能花多少？ 🍷

[【返回目录】](#)

茅于軾：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茅于軾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茅于軾先生

我国教育目的比较普遍的认识是培养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为国家培养人才，把自己培养成有用之才。总之教育的目的是人才。至于这个人才为谁所用，用于做什么事，好像不在教育目的的思考之内。只要培养出人才，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恰好是我国教育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受教育者本人，不是为了别人。“人才论”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别人的工具，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人生。是的，人才论也不错。人必须有一定的能力，能够解决问题，能够靠自己的才能养活自己。但这并不是最后的目的，这只能是实现良好人生的手段。

而我们现在的教育，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应试教育就是从此而来的。教学生会考试，会解题，将来能在社会上立足，谋生。这就是现在教育的终点。这里缺的是人生意义的追求，生活的美满。活一辈子，是别人的工具，或者是自己的工具，而目的是不明的。

教育要对谁负责？不是对国家负责，也不是对社会负责，而是对受教育者本人负责。所以不是为国而教，是为人而教。教什么，固然要教怎样谋生，有一技之长。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有美满人生。自己享受人生并帮助别人享受人生，使全社会快乐总量极大化。这才是教育的根本之道。教育是最个性化的事。教育的对象一定是一个人，就是受教育的那个人。所以教育是为了受教育者本人。

一个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一辈子过得愉快、丰满、有意义，不白活。这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他不但要有才，能够自谋生路，而且更要有美好的家庭，亲密的朋友，有创造性的活动，能够不断对好奇心有追求，懂得对美好事物的欣赏。特别是能够判别真善美。不至于把假的当成真的，把恶当成

善，把丑当成美。这些都超出了人才的范围。

我们现在的教育正好在这方面太过薄弱。学生整天忙着解题，背诵，但不善于判断最基本的是和非。文化革命固然有伟大领袖的发动和领导，但是的确有千百万群众的响应，才会搞出这样的人类浩劫。原因就是百姓都被培养成了工具，对真善美和假恶丑没有判断力。这一状况至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过来。因为教育还停留在“人才论”上面，人还是一个工具。

如果全社会没有对真善美的判断力，说不定那一天社会再次沦为假恶丑的肆虐之所。追求自我的人生目标，绝不是忽视别人的人生目标。因为一个人能不能获得美满人生，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更需要周围环境的配合，需要他人也有帮助别人的良好习惯。每个人都要“成人之美”，不要妨碍他人最求美好人生。所以人生的目的是“自己享受人生，也帮助别人享受人生”。同时这也是教育的目的。此时教育目的从“人才”上升到了“人生”。



在法国，小学生开学第一课，
要先去图书馆借课本，一般不会举行开学典礼，孩子们只需到校半天，
认识老师、同学，熟悉教室，了解校规，气氛相当轻松

“人才论”并不错，但是过于功利主义。适当的功利主义也不错。人应该有才，能够谋生。所以应试教育有其合理性。问题在把功利看成目的，看成最终目标，那就错了。比较中国的教育和发达国家的教育，其主要区别也在此。在中国从小学开始就以教读、写、算为目的，为的是将来上一个好中学；上好中学的目的是上好大学；上好大学的目的是找好工作；找好工作的目的是赚大钱。最后围绕一个“钱”字。

外国小学不以读、写、算为目的，而是教学生怎样处理人际关系，要与人为善，要有礼貌，要遵守

公共秩序，对知识有好奇心。到中学逐渐强调读、写、算，到大学强调独立思考和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人不是别人的工具，也不是自己的工具，对事物常常问为什么。因此比较不容易上当受骗，有对真善美有鉴别力。这样的社会比较个性化，比较稳定，不会起哄，不会盲动，也容易治理。比如群众性的踩踏死伤事件就不容易发生。这类事件多半由于瞎起哄造成。



英国的小学生刚入学时，
首先要接受的必修课程，是网络安全教育，学校认为有必要向学生传授有关网络潜在危险的知识，
以便帮助学生在纷繁复杂的虚拟世界中更好地保护自己

反观我国近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似乎越来越朝功利化的方向走。在系科设置上越来越朝技术，操作方向倾斜。系科分得很细，越来越专门，讲一般理论的比重越来越少。大学毕业生会操作不懂道理。

专业分工太细，人生的道路很狭窄。不大明事理，不懂得怎样做人，做一个对人受欢迎，对己活得愉快的人。课堂上不讲真善美，不鼓励好奇心，许多大学生从来不给老师提问题。学习的目的只要能找到好工作就是好样的。学校之间的竞争也以就业做指标，甚至以就业的工资待遇做指标。把“人才论”推向了极端。

这样的大学生进入社会，全社会都以 GDP 为目标。其他一切都屈从于 GDP。国家在财富增长方面全世界第一，但是钱主宰了一切，也腐蚀了一切，社会的道德也屈服于财富创造。官位可以买卖，连踢足球的胜负也可以成为赚钱的门路。当然，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多，但是教育的迷失方向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人们常说，教育是国家的未来，这是不错的。把学生领向何处，国家就会走上什么道路。教育目的的“人才论”显然是有问题的。 ❏

[【返回目录】](#)

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行政部门对教育资源的配置公正吗？

[本文首发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中评网]

教育作为一种服务方式，一般是老师教，学生学。如果不交学费，老师可以将学生拒之门外。所以，教育服务具有排他性。教育服务，尤其特定区域内的优质教育服务，由于学校能容纳的学生有限，竞争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边际上，一个学生获得入学资格，另一个学生就不能获得。因而，教育服务具有竞争性。所以，一般而言，教育是一种私人物品。

然而，在某些方面，教育具有一些公共性质。第一，在初等教育阶段，如果某个孩子因为家里没钱就不能接受教育，就损害了起点平等的原则。第二，如果学校承担了学生的部分行为规范的教育义务，那么就具有外部性。第三，大学和高等研究机构又有着探究公用知识的职能。这些公用知识就是知识的公共物品。第四，家长主义关怀。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政府干预教育的理由之一就是“对孩子们和其他对自己行动不负责的个人的家长主义关怀”。第五，在学校之间可能会出现恶性竞争。如在周末加课等。所以可能需要对恶性竞争加以管制。

总体而言，教育服务是有部分公共性质的私人物品，因此应以市场制度为配置资源的基本制度，辅以非市场的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来克服市场失灵部分。

然而在我国现实中，教育领域的资源主要是由政府行政部门配置的，配置资源的方式有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的方式是由行政部门自己直接配置资源设立公立学校。因而我国现在主要是公立为主民办为辅的学校格局。间接的方式包括对民间办学的准入管制，对学费水平的管制，对招生数量的管制，对学校设立院系和专业的管制，对招生优先顺序的管制，对教师资格的管制，等等。这些管制都会对资源配置产生间接的影响。

行政部门配置资源当然有其优点：(1) 对资源有较强的当下动员能力；(2) 可集中全社会资源实现某一重大单一目标；(3) 可将有限的政府资源用于对市场失灵的弥补，以实现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等。

而其缺点也很突出：(1) 缺少分散的、在具体交易环节中产生的信息；(2) 行政部门配置资源没有市场信号；(3) 上级机关在资源配置方面有优先权；(4) 领导最“聪明”，容易埋没其他人的聪明才智；(7) 单一目标的考核机制会以损害社会其它目标为代价；(8) 视野较短，期待短期见效，带来配置的无效率；(9) 缺少纠错机制。

在中国，由于政府结构还存在缺陷，上述行政部门的缺点还会放大。行政部门对资源配置的规模和行为缺少立法机关的界定和约束，也缺少司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制约。因而，存在着行政部门独大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部门配置资源就已经偏离了市场规则和标准的公共选择程序，而是依行

政部门的意志而配置资源，所以行政部门对资源配置的领域、规模和行为会大大超出应有的范围，且具有行政部门自身的倾向性。

从效率角度看，行政部门配置资源的恰当范围，就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对市场失灵的补救，如果行政部门超出这一范围去配置资源，就会带来效率损失。这是因为，第一，在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采取行政方式配置资源，必然会偏离市场均衡状态，一旦如此，就会产生效率损失。第二，当公共物品数量超过恰当数量，就会导致单位边际投入的公共物品带来的边际效用总和小于私人物品的边际效用。这也是无效率的。

合理的进入管制一般只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自然垄断情形下，一是为了保证从业者的从业资格。在其它情形下的进入管制，都会无端造成竞争的减缓和供给的减少，使消费者不能享受供给竞争带来的好处，和供给充裕带来的低价和便利。所以，这些进入管制本身不仅无效率，也不公平。

关于价格管制的效率评价标准，如关于自然垄断产业的定价，经济学有过不少研究，一般的结论是，可采用平均成本定价，复合成本定价，以及拉姆齐定价等。如果管制定价有明显偏离，就意味着管制价格的无效率。当然，在市场可以定价的领域由行政部门定价，本身就是无效率的。这个效率标准经常与公正标准相重合。

关于公正，我们采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作为标准。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是说，每个人最大的平等的自由；第二正义原则是说，如果可以接受一些不平等，就是要向弱势群体倾斜的不平等。我们可以将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看作是市场原则。也就是说，没有必要理由而违背市场规则，就是不公正。我们将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用来评价行政部门配置资源的公正性。

一般而言，由于财政资源的分配就是人为的，所以公正的财政资源分配应是平均分配，因而财政资源分配的基尼系数应是零。如果实在无法实现财政资源平均分配，可以容忍较小的基尼系数，如，0.1，然而要强调的是，这种不公平的财政资源分配应遵循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即要向收入最差的人群倾斜。其限度，应是这种倾斜不应改变现有的收入结构，即最穷的人的补贴不应使其总收入超过次穷的人的总收入。

根据上面的效率标准，行政部门在教育这个可以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来配置资源，本身就是无效率的。同时行政部门对教育的多方管制，也违反了上述管制的效率标准，也是无效率的。在本文中，我们侧重于讨论行政部门配置资源的公正性问题。当然不公正都同时是无效率的。

研究表明，教育部门的资源配置是不公正的；本来财政资源是人为地配置，应该在个人间平等分配，如果实在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也应是向弱势人群倾斜；然而，在我国，教育服务的财政资源分配却向富者和有权势者倾斜。在本研究中，我们更多地分析资源在地区间的分布。在地区分布上，资源更向行政权力中心倾斜。我们知道，211 学校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投入。将各省市 211 学校数量比上本省市人口数量，比例最高的是北京 1.11 所/百万人，其次是上海 0.38 所/百万人，最低是河南省

0.016 所/百万人，北京的“211 密度”是河南的 69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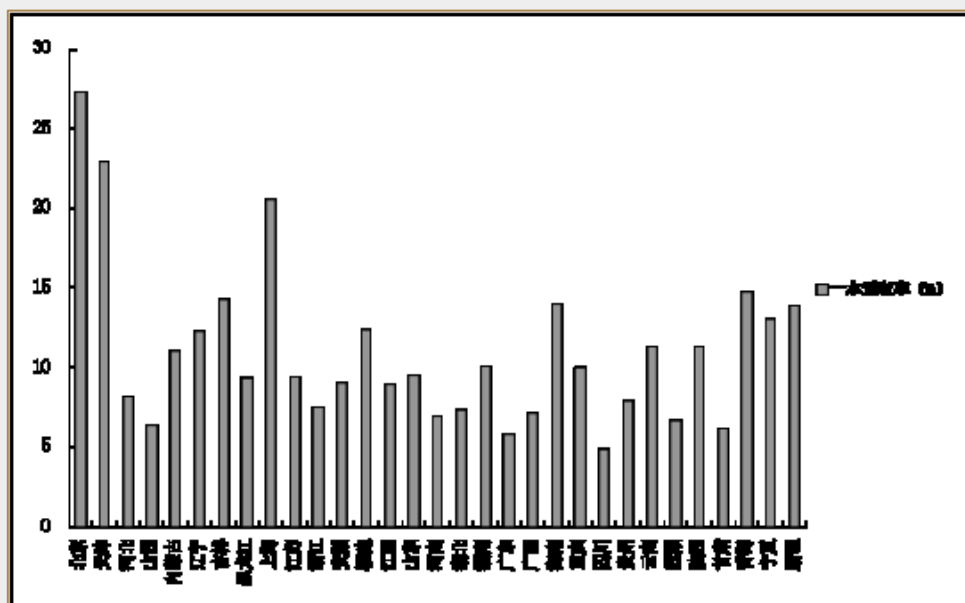
“211”学校的分布密度



注：颜色越深，密度越高

录取机会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假定各省考生在智力上是随机分布的，各省的录取机会应该是大致相当的，有不同也不应该多年持续。所以，“机会均等”既是一种公正原则，又可以用来定量地衡量资源分配的公正性。我们根据这一原则，提出“录取机会比”的概念，即以最低录取率为基准，其它地区、单位或人群的录取率与它相比的倍数。在下表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北京、天津和上海的“一本录取机会比”是 5.6，4.7，4.2。也就是说，它们的考生被一本院校录取的机会是最低录取率的四川考生的 5.6 倍，4.7 倍和 4.2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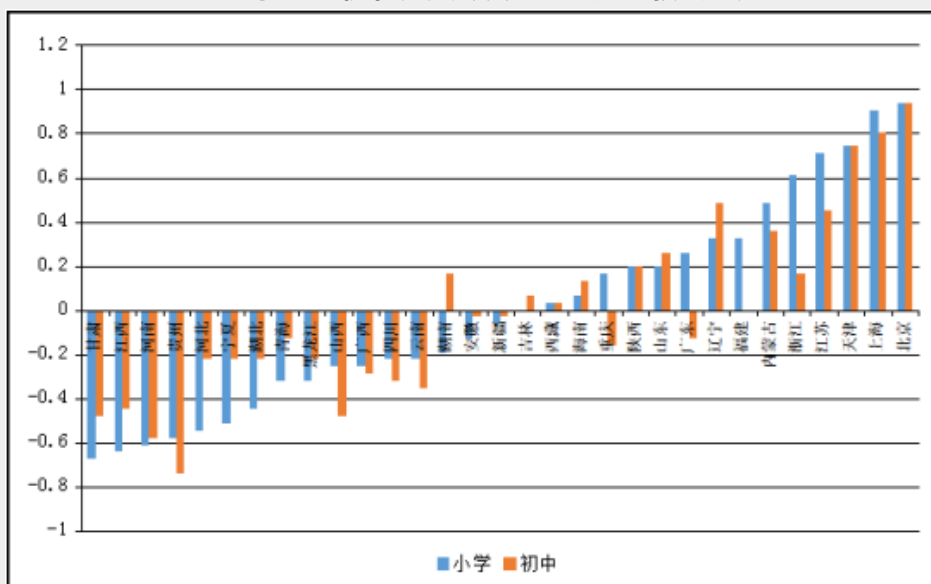
各省高考一本录取率比较 (201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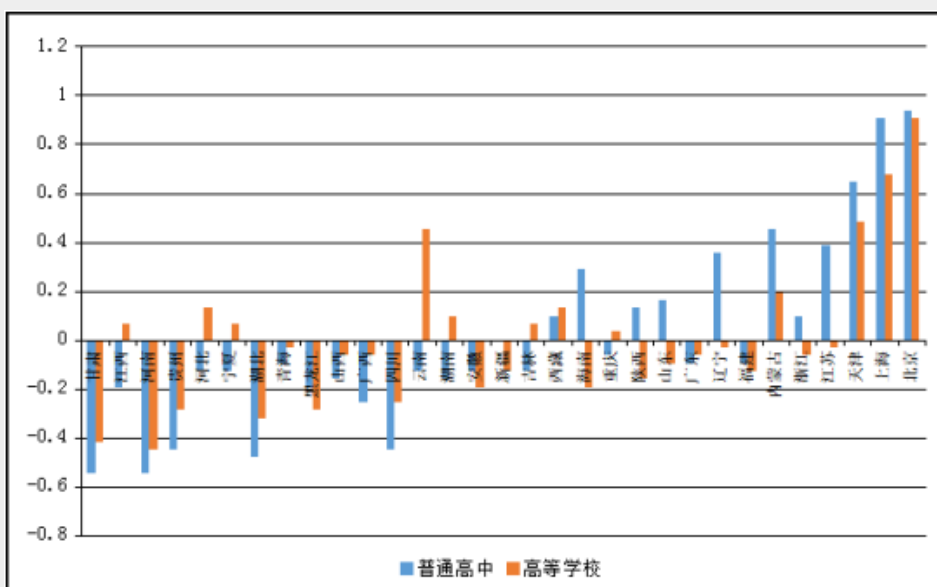
除了高考一本录取率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表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综合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是指 18 岁到 22 岁应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实际接受了各种高等教育（专科及其以上学历）的人数。2012 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30%；北京已超过 60%，贵州仅为 25.5%。

最直观的行政部门对资源的配置还属对财政资金的配置。为了对财政分配的公正性有更准确的描述，我们根据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设计出“相对损益指数”和“公正性指数”。下两图是从小学到高校的生均财政补贴相对损益指数。在横轴上，各省市按人均收入从左到右递增排列，纵轴则是各省市的“相对损益指数”。计算规则是，处于右边的地区与所有处于它左边的地区比，如果有一个地区的生均财政补贴比它低，则记 1，有两个则记 2，依次类推；如果比它高，则不记分；也与处于它右边的所有地区比，如果有一个地区比它高，则记-1，两个则记-2，依次类推；如果比它低，则不记分。每一个地区的得分除以地区数，就是它的公正性的“相对损益指数”。

省市间小学和初中教育财政资金配置的相对损益指数



省市间普通高中和高等学校财政资金配置的相对损益指数



在图中，相对损益指数越高，说明一个省市在这个财政分配体系中越获益，越低则越受损。在用人均收入进行修正、以剔除各省间人均收入差距以后，各省的生均财政补贴仍有较大差异，尤其是小学和初中，竟然呈现出人均收入越高，生均财政补贴越高的现象。在其中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和天津的小学的“相对损益指数”分别为 0.935，0.903，0.742，根据下表的解读，处于“极不公正地获益”的位置上。

相对损益指数价值解读

数值	-1 ~ -0.6	-0.6 ~ -0.2	-0.2 ~ 0.2	0.2 ~ 0.6	0.6 ~ 1
价值解读	极不公正受损	不公正受损	较公正待遇	不公正获益	极不公正获益

我们将每个地区获得生均财政补贴高于比它穷的地区的数值累加起来，与完全不公正的情形去比，就得出“公正性指数”。它可以用来描述一个财政体系的公正性程度。在不同教育阶段，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的财政分配体系的公正性指数为 0.602、0.484、0.430 和 0.310。按照本报告的评价标准（见下表），小学、初中和高中价值解读是“差”，且小学不公正程度最显著。高等教育的财政分配体系的公正性为“中”。

公正性指数价值解读

数值	$0 \leq J \leq 0.1$	$0.1 \leq J \leq 0.2$	$0.2 \leq J \leq 0.4$	$0.4 \leq J \leq 0.7$	$0.7 \leq J \leq 1$
价值解读	优	良	中	差	劣

同样的方法可以用于一省之内。如用财政体系的“相对损益指数”和“公正性指数”来描绘财政资金在江苏省内分配的公正性。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的教育财政资金分配体系的公正性指数为 0.410、0.603、0.654，价值解读均为“差”。

在上述教育资源在地区间分配向行政中心倾斜的基础上，在同一地区的不同人群之间，也明显存在着资源分配的不公正。据一些研究，高层（高级和中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比中层和低层（工人、农民、下岗、失业、家务）更多地享有城市重点中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辈出率（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约为平均数的 2~6 倍，高低阶层的辈出率的最大差距为 14 倍。

还有一个严重的不公正问题，就是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虽然《义务教育法》中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但实际上存在着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歧视。最严重的要属北京市政府 2011 年强行停办拆迁 20 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恶劣行为。数据显示，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流动人口子女的学费分别为 370 元和 622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的 76 元和 170 元高出很多。

在这种制度化的配置无效和不公正的情况下，人们就通过各种形式，如交“赞助费”进入到较好的学校，用高考移民的方式进入到高考录取名额较多的地区，学生从乡村向城镇、小城镇向大城市的学校的“移民”以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再有就是用脚投票——到海外留学，对这种行政部门无效率也不公正的资源配置进行纠错。

但尽管高考移民的根源在歧视性高考录取制度，但现实的政策操作几乎不问制度本身，而是指向高考移民考生。

例如，2005 年 9 月，教育部、公安部联合下达通知，要求各高校“针对高考移民现象对本地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商请有关部门从严掌握、审慎出台‘高考优惠’作条件发展本地经济和吸引人才的政策，……”2008 年青海省文科状元王某以 655 分的成绩报考了清华大学，最终被查出属“高考移民”而取消录取资格。2009 年内蒙古规定身份证号前两位不是 15 的考生要进行学籍审查，2010 年的文件规定凡父母双方或一方户口不在内蒙古区、本人户口在内蒙古的考生都要进行学籍审查。2011 年，陕西省宝鸡市返回户籍地报名的高考考生共 6082 名，占考生总数的 14.85%。

教育行政部门也采取一些遏制择校热的措施。如直接禁止以钱择校，直接禁止为择校而生的培优机构，直接禁止公办学校教师参与择校相关活动。还有就是把优质教育资源直接分配给所有下一级学校，希望通过优质资源均等化，减少基础教育学校间的差异。但在实际上，大多数地方政府仍对不同学校给予不同的生均财政补贴，即一直维持学校优劣差距，却坚持禁止择校，这种行政行为显然没有实现教育资源均衡的诚意。

所以尽管存在着民众自发的纠错行为，由于整个制度的系统性错误，以及行政部门维护现有体制的作法，教育领域还存在着很严重的资源的剩余错置，以及相应的不公正。而不公正的制度和事实本身，又是具有反教育性质的。

我们的基本结论是，行政部门对教育领域资源的配置，在已知无效率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减少不公正的情形，反而加重了不公正。本来应该获得财政资金倾斜的较低收入地区和人群，反而获得更少的财政补贴。更重要的是，这种对不公正程度的加重，并不是制度的疏漏，毋宁说这就是行政部门的目的本身。而这一目的，就是使得资源的配置更有利于配置资源者自身。

我们对教育领域的改革建议是：

(1) 取消对教育服务的进入管制；建立开放的教育体制，鼓励更多民间力量和国际办学机构进入教育领域，行政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比重要逐步缩小。

(2) 取消对所有对种类学校的不当行政管制，包括招生数量管制，院系专业设置管制，学费管制，教师资格管制，等等，尊重和保证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3) 取消高考录取配额制度，或统一高考，或分校高考，建立公平与高效的考生与高校之间的“配对机制”。在高校没有真正办学自主权时，取消高校的“自主招生”。

(4) 取消对不同学校的财政补贴的区别对待方式。取消基础教育阶段的重点校和重点班；在地区范围内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资源大致均等化配置；取消高等学校的行政级别和 985、211 和一般高校区分，让自治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评审引导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取消高校重点学科评审和硕士博士点的行政评审，由学术机构或专业学会评审。

(5) 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停止打压由于教育制度和政策本身错误引发的群众对策行为，如异地高考、择校等。

(6) 更多地动员民间资源投向农村地区中小学教育，政府行政部门采取教育券的方式补助贫困家庭学生。优化高等学校空间布局，新设高等学校布局向二三线城市倾斜。

(7) 一视同仁对待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国际办学。取消在土地、税收优惠、融资、地方公共设施 and 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保障、职称评定等方面存在的歧视性政策规定。

(8) 政府行政部门有义务辅助办学资源薄弱的学校。给定适龄儿童入学人数，在政府行政部门无法提供教育服务的情况下，应鼓励民间办学，并对其财力的不足予以补助。这种辅助性责任体现为扶持薄弱校达标，而不是以办学资质标准将适龄儿童拒之校门之外造成辍学和失学。

(9) 对于义务教育，除了基层地方政府负有财政责任之外，中央或高层地方政府也负有财政责任，甚至担负比基层地方政府更大的责任。义务教育交给地方学区主管，但对义务教育的公共投资则至少由省政府和地方学区共同分担。

总体而言，在宪法层次，明确教育服务主要应由市场制度配置资源，行政部门如要介入或管制，必须说明理由，并经立法机关批准。行政部门配置资源的行为要受到立法机关的约束和监督，动用财政资金的配置，必须要遵守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如违反这一原则，应可问责。 ■

[【返回目录】](#)

陈远：民国教育的两翼格局：权力，靠边站

[陈远 历史学者。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拍卖时光]

大概是从 1998 年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时陈平原先生那本引发洛阳纸贵的《北大旧事》起，学界谈论大学成为风气。一时之间，大学史甚至是教育史一跃成为显学，议论大学之风气延宕至社会各界，至今不衰。

时贤谈论民国大学，总希望为当下找到启示和借鉴，私意以为其实大可不必，为何？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教育，更何况当下的大学问题，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理念和格局出了问题。技术的问题，可以在教育的层面解决，而理念和格局的问题，则有赖于教育之外更大范围的整体环境。

如果我们认同教育是培养“人”而不是造就机器这一点观点，就应该明白，**大学的成功，不是简单的向哪所大学看齐。好的大学，原本就应该姿态各异**，在这一点上，民国的大学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范本，比如——



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执掌之后，确定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一宗旨。在 1917 年初的那一天，蔡元培以质朴的姿态走进了北京大学，向在排列在校门口迎接他的校工们脱帽致礼。也是从那一天起，他给中国大学定了一个恒久的调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在这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象之下，老北大校园内各种思潮交相激荡，不仅有黄侃辜鸿铭刘师培这一类旧派学者，也有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新潮人物，最后还衍生出最早的布尔什维克。

1914 年 11 月 5 日，梁启超应邀到清华给当时的学子作了题为《君子》的演讲，引用《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这篇演说词在民国三年十一月十日的《清华周刊》第二十期第一版有刊录。此后，清华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写进了清华校规，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清华校训。清华大学在 1917 年修建大礼堂时，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刻在巨型校徽上并镶嵌在舞台正额，激励后学。至今，这一校训依然在深深影响着清

华的学子。而真正奠定清华大校格的梅贻琦校长，更是深深懂得体味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的深味，教授治校的思想虽然是由蔡元培提出，但是得到圆满的贯彻确实在清华，而梅贻琦，正是这一制度的催生者。因为深深懂得“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道理，梅校长坚决不做外行领导内行之事，甘居“王帽”，所以在清华园内，学术本位的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两岸的清华提到梅贻琦，不约而同都以“永远的校长”称之，即是对老校长的怀念，也是对他为清华奠定的学风的怀念。北大，当不当得起大学的大？当然当得起，但是我们看当时的清华也好，南开也好，或者是燕大或者浙大也好，这些当时也居于一流大学的后起之秀，并非简单的跟着北大亦步亦趋。

南开和燕大，则又大不一样，北大一出生就有着“京师大学堂”的堂堂出身，虽然初期汗漫着一些陈旧气息，但是帝国大学的地位却毋庸置疑，清华建立虽然是因为国耻，但恰因国耻之故获得了庚子赔款的返还，财力充沛。而南开肇始于仅有十几个孩子的严修家馆，尽管胡适说“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与合作，自南开初创时起，这是一件美满的事”，也尽管南开后来获得当时国家领袖蒋介石“有中国必有南开”的赏誉，但是做为“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恐怕只有张伯苓才深知在当时中国创办一所私立大学甘苦。南开大学不比北大，有着帝国第一大学的出身，也不比清华，有庚款做为财政后盾，他深知南开的每一分经费除了校董的捐助其余都来自学生，这样的状况使他在南开创建之初就非常注意让南开密切联系社会。南开校友韦君宜先生的女儿杨团老师这样对我说起南开：母亲跟我说南开中学跟别的学校最大的不同就是并不让学生成天看书。当时南开的校长是张伯苓，是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张校长总是教导学生要接触社会，本着“允公允能”的教育家胸襟培育学生要有公心，要承担社会的责任。张校长当时带着母亲和她的同学们参观监狱、带她们走街串户，参加社会劳动，让她们看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看到社会最底层的现象和生活。这种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南开大学，“土货的南开”，其来有自。

从私立这一角度上，燕京在某种程度上与南开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因为教会背景，多了一些宗教色彩和国际色彩，司徒雷登真是有超越时代的思想，在那个时代融汇了世界各国的大师级人物创建了燕京这个“可爱的社区”，世界文化熔冶于一炉，燕大学子身处其中，成为一代世界公民。文学家冰心、最有良心的医生蒋彦永、历史学家余英时以及法学家江平，都是这个可爱的社区里培养出的世界公民的代表。

民国的大学校长：有职有权有担当

大体而言，过去的大学，大抵上和一个人差不多，总有一些自己的特性。这些特性发展到了相当显著的时候，就成了所谓的性格，在大学来说，就成了所谓的校风或者校格。一个学生从哪个学校出来的，从他的言谈举止就能推测个大概。那时的大学何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环境下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独立性，大学怎么办，校长可以说了算。那时的大学校长，也深知教育独立的重要。“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说过这话的蔡元培先生，当遭遇政治干涉到他办学的自

由时，不惜挂冠而去：“绝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这种掷地有声的话，于今天，已经成为绝响。但是在当时，梅贻琦也好，张伯苓也好，司徒雷登也好，身上都有这种可贵的品质。大学怎么办，校长可以说了算。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

我们常常说过去的大学校长有担当，这种担当的背后是有职有权。

可是现在呢，一则五十年代的故事可以为当下的情况做下注脚：1951年5月，经政务院任命，马寅初出任解放后第一任北大校长。马校长是从旧社会中走出来的，但是和那个时期的校长却又迥然不同。我们且来看看马校长的就职演讲：“同学们或许要听取我的建校方针，这点不免使诸位失望。我认为建校方针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大学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的方针为己任”。马校长在北大执政近十年，对于北大乃至全国大学后来的发展模式影响至深。另一位对新时期教育走向影响深远的则是清华的蒋南翔校长。1952年底，蒋南翔出任清华校长的时候，院系调整已经完毕，当年的文学院、法学院已经人去楼空。蒋南翔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擘画新清华的道路的。1958年，蒋南翔提出了“又红又专”和“听话出活”两个口号，要把清华打造成“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也是在1958年，一场教育理念之争，由校园扩大到社会，由教育扩大到政治，是清华大学1949年之后改造最为激烈的定点，就此扭转了清华之前的传统和学风。也是在那一年，清华里“不听话”的教授和学生共有571人划为右派，其中教职员222人，学生349人，占学生总数的5%。如果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丧失于马寅初在北大倡导的“思想改造”，那么学生之驯服乖巧则始于蒋南翔“听话”的倡导。

近二十年来，学界坊间关于教育之议论，依然多集中于“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等旧日论调，一如这二十年来的教育状况，几无变化。这样说，当然不是否认这些价值取向有问题，学界坊间论调缺乏变化不能说没有理由：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面对的是相同的问题。

好私立大学得到财政支持，不好的国立大学财政被缩减

吾国教育，何以至此？个人以为，1949 年之后的教育症结所在，正是行政主导而非教育主导。如果一个大学校长对于建校方针没有发言权，让他如何对大学负责？他需要负责的，只是任命他的上级机构而已。于光远先生说“1949 年之后只有教育官没有教育家”，真是一针见血，而在步入 21 世纪的今天，时时盘桓在我们耳边的一个声音则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按理说，有了更高层面的整体统筹安排，整体的教育格局应该更加合理，可是不然，当我们回顾民国教育时，会发现，恰洽是在看似“一盘散沙”的状况下，民国时期的教育格局亮点多多。

我在研究燕京大学的过程中发现，民国时期的教育，在大学层面来讲，以清华北大这一类的国立大学为主，形成了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足鼎力的差序格局。过去我们说到私立大学，想到的常常是像南开、光华、大同、厦大这样的本土私立大学，对于像燕京这样的教会大学较少关注，这里面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有意遮蔽。众所周知，1952 年的院系调整，一大批优秀的教会大学一夜之间被全部撤销，其中包括以人文学科以及医学人才享誉中外的教会大学之首燕京大学、以法学见长的东吴大学、以教育学见长的辅仁大学、被誉为“中国现代工商业人才摇篮”的圣约翰大学和以农业研究最为出色的金陵大学等等。另一方面，这些大学之所以不大被提起，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学界认为这些教会学校是外国的教会学校，不能算是中国教育的一部分。但私意以为，要是考察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教会大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一是 1925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私立学校立案条例之后，大多数教会学校都相继向北洋政府注册成为私立大学，其次是从教会大学对中国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是一个积极正向的影响，为中国培养出大批的人才。从这两点上讲，教会大学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大学这样一个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的弹性序差序列是一个非常好的格局，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在那样一个环境中，坏的大学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成为好的大学，好的大学如果不努力就沦为坏的大学。因为在这样的大学格局中，大学的优劣不是由体制筛选的机制决定，而是由社会筛选机制决定。大学办的好不好，权力说了不算，要有社会的认可才行。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政府对于好的私立大学，也会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以便使“已有成绩的学校变得更有成绩”，1934 年燕京因为受到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财政上出现困难，胡适就曾就在《独立评论》上撰文为燕大呼吁：凡是好的学校，都是国家的公益事业，都应该得到国家社会的热心赞助。学校只应该分好坏，不应该分公私。在英美两国，私立学校最发达，社会所信任的往往是私立的。这些私立大学往往能得到政府绝大的帮助，社会上人也最热心捐助。后来在胡适的斡旋下，民国政府拨款 6 万元资助了困境中的燕京大学。而南开大学更是由于办学出色，获得了国民政府的着意关照，从 1932 年开始，国民政府就一直给南开提供资金支持，并且从 1932 年，1933 年，连续两年的 6.2 万元猛增到 1934 年的 14 万元。同

年，教育部又补助 4 万元。另外河北省教育厅补助 6000 元，总计达到了 18.6 万元。当时南开大学的年收入 40 万元，政府公款补助占 45%左右。这在当时的私立大学中是比较罕见的，足见作为私立大学的南开在当时民国教育所占的地位。反之，国立大学办得不好，政府会在财政上缩减，完全是以学术水平作为标准。反观今天，国立大学一家独大，无论办得好坏总有财政拨款。作为行政任命的大学校长哪有动力去办教育，全把心思放到如何揣摩上层机构的想法还怕不够呢。每念及此，都不免想让人长叹一声：悲哉，中国大学！

民国幼儿园：没有太多政治和功利，鼓励儿童发现自己的世界

除了大学教育，民国各阶段的教育也都可圈可点，比如上文所述的张伯苓，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也是民国中学教育的典范。而陈鹤琴则是科举废除之后具有现代意识和教育思想的儿童发蒙者的代表。从陈鹤琴之后，中国的儿童教育才可以说有了一个质的变化，进而起步发展的。

陈鹤琴的童年受到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但是后来在清华和哥伦比亚的经历对他影响显然更深。在陈鹤琴所著的《我的半生》里，对于自己童年的私塾生活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过去总是说私塾如何如何不好，其实在陈鹤琴的叙述里，私塾既有不好的一面，也有有意思的一面。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起始阶段，就是在像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陈鹤琴等一批接受传统教育的士子们受众完成的。



陈鹤琴和孩子们

私塾教育时期对于陈鹤琴的人生观起了很大的影响，用陈鹤琴的话来说就是：“童年时代的人生观，还不是一种显亲扬名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比较纯洁、天真而已。”现在的小孩子应当说比陈鹤琴时代的教育好多了，但是要说起人生观的确立，平心而论，还不如那个时代，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也没有太多的功利色彩。

1919年初，陈鹤琴即将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正好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郭秉文到美国物色教员，力请陈回国教书，并许诺3年后设法送他回去完成博士学位。陈鹤琴于是接受聘请回国了。在陈鹤琴回国的最初8年里，除了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教职之外，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儿童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学术活动之中。这其中应该有童年教育的影响。

哥伦比亚的师范学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学校。那里对于教育的研究注重的是实践调查。陈鹤琴回国之后对于儿童教育的研究走的也是这个路数。当时他的大儿子已经出生，陈鹤琴就开始拿大儿子做实验并且记录观察的结果，为他后来从事儿童教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种实证的精神，现在没有了，所以后来出不了伟大的儿童教育家，也不是偶然的。当时一个堂堂大学教授搞儿童教育，在别人看来仿佛是件可笑的事情，但是陈鹤琴却是乐在其中。

1923年春天，陈鹤琴提出设立幼稚园的主张，得到了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支持。这一年的秋天，中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就诞生了。幼稚园就设在陈鹤琴家里，陈是园长。

关于鼓楼幼稚园的意义，不用说得太多，只要看看钟昭华曾经写过的一段话就够了：“中国最著名的幼稚园，不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吗？开辟中国幼稚教育的园地，不是南京鼓楼幼稚园吗？”在南京鼓楼幼稚园的发展过程中，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也日益完善并成熟起来，并在后来创办江西幼师时形成“活教育”的思想。关于“活教育”，陈鹤琴说得很明白：“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这种教育应该遵守一个原则，那就是，‘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让他自己想’，‘鼓励儿童去发现他自己的世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裁’等等。**现在这些话还有人在说，但是看看现在被作业压弯了腰的孩子们，就知道，陈鹤琴的话距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了。

以上所述的大学、中学和幼儿教育，我统称之为教育系统之内的教育（此一称谓为笔者生造，为区别一下所论述的“教育系统之外的教育”），于此之外，谈论民国时期的教育格局，还不能提及教育系统之外的教育，其中包括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以梁晏阳初和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或曰平民教育，这一支虽非民国教育的主流，但却与教育系统之内的教育一起共同构建了民国教育丰富而又多元的格局，故而我将民国教育这两支称之为民国教育的两翼。接下来，我们对于民国教育这一支择要简述之。

民国职业教育：仅百万人口的南通县拥有约20所职校

民国最成功的职业教育团体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者是黄炎培，而黄炎培在教育上的启蒙者，是蔡元培先生。1901年，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当时，蔡元培恰在南洋公学任教。南洋公学的规模并不大，师生之间接触也就比较多。黄炎培受老师蔡元培的影响，从此埋下了投身教育的种子。时隔不久，南洋公学爆发学潮，黄炎培在蔡老师的启发下，回到老家川沙，创办了川沙县第一所新式学堂——川沙小学堂。之后又先后创办了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上海城

东女校、浦东中学等学校。在教育实践中，黄炎培感到旧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学用脱节。1931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当时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弊病，首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并具体提出小学各科的教学应与儿童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不强调学科本身的系统性，重在具体运用；要因科制宜地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重视实物教学等等。此文可以视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端，文章发表之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间竟成思潮。黄炎培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教育界的地位。

而在此之前，被袁世凯称为“与官不做，与事生风”的实业家张謇也已经开始职业教育的摸索。张謇创办职业教育时还谓之实业教育，其指导思想是“以教育改良实业”，以实业的发展为职业教育的出发点。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实业有了成效之后，张謇便开始创办职业教育。张謇从“纺织须棉，须增产棉地”，“有棉产地，须讲求改良棉种及种法”出发，于1902年欲在通海垦牧公司开办他的第一所职业学校“农学堂”，培训农垦技术人员，但因交通受阻而未成，1907年在通州师范附设农科。张謇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艰难曲折中，深感中国缺乏机械、纺织工程学等方面的人才，而纺织需要纺织专门人才，因此设立纺织学校。这样，中国最早的一所棉纺织学校应运而生。1912年张氏弟兄在大生纱厂附设了纺织染传习所，1913年改称纺织专门学校，以“校所养成之人，供南通一县之用”，在我国开创了纺织高等教育的先河。随着张謇创办纺织工业的成功，南通的实业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各种技术和各类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张謇在“农工商皆资学问”思想的指导下，倡导和创办各类职业学校。到1920年前后，除了通师曾附设有测绘科、工科、农科、蚕科，女师曾附设有手工传习所外，还陆续创建了商业学校、银行专修科、工商补习学校、女红传习所等。张謇为了适应“地方自治”的需要，还办了宣讲传习所、巡警教练所、交通警察养成所、监狱学传习所等，共有20个左右不同专业的职业学校。仅有百万人口的南通一县竟然拥有这么多的职业学校，在当时的国内是绝无仅有。而民族工业发展较早的无锡，荣氏兄弟1919年才创办他们第一所职业学校公益工商中学，1928年以后才举办“申新总公司职员养成所”；蒋寿萱于1930年才办了“华新制丝养成所”，唐星海于1931年才办了“庆丰纺织养成所”。无锡的民族资本家所办的职业教育，不仅起步在南通之后，而且其投资和办学数量也远不能与南通相比。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张謇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宋汉章等48人在上海发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之初，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有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黄炎培继而指出：“教育本以适应需要为主，职业教育更不能离此原则。赶速完成应修之课程，进而谋农、商界之联络，注意需要，勤求实用，自是介绍毕业生出路之良法，又足为将来发展之地步。”“社会化，是黄炎培所主张的职业教育之特征，他主张办理职业教育必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发展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而且，“职业学校设哪一科，乃至一科之中办哪一种，完全需根据那时候当地的状况。”

1934年经中华职业教育社公订：“职业教育的目的：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基于上述认识，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确定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全国性教育团体。华罗庚、徐伯昕、顾准、秦怡等人，都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培养出来的接触代表。

民国平民教育：晏阳初定县推四大教育，陶行知“到民间去”

说完中华职业教育社，再来说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说起平促会，则不能不说到晏阳初。1943年5月24日晚的美国纽约卡内基礼堂，那里灯火辉煌，贵宾云集。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南美各国的几百所大学和高等学术机构发起的“全美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大会”正在举行。



晏阳初

在这次大会主席台上，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类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他们是爱因斯坦、杜威……晏阳初。晏阳初是这十大伟人中 youngest 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获得这一称号的理由是：“他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千万不识字的心智。又是他的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的方法，肥沃他们的土地，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与大多数当时留学欧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一样，作为民国初年的留美学生，晏阳初不仅受到过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更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1918年晏阳初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前往法国一战前线为二十万华工服务，晏阳初后来回忆说，他到那里去本来想教育华工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华工教育了他。可

以说，晏阳初正是在这里开始了其献身平民教育的生涯。后来闻名于世的“定县实验”就是从那时候发端的。

1929年，晏阳初到了定县。他穿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有人评价说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在定县，晏阳初说：“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中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概括起来可以说是推行四大教育，就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其中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晏阳初有一个认识：“没有任何一国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只有这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否则将没有和平可言。”可以说，晏阳初和平促进会所做的一切，指向的都是这个目标。

在晏阳初发起全民识字运动的同时，同为杜威学生的陶行知(陶知行)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他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1926年他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1927年初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及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他的理想是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陶行知投身教育，受到了强大的时代因素的影响。早在1914年金陵大学文科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就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这表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了投身教育的思想和志向。

他远赴美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1917年毕业时，他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回国投身教育。他在归国乘坐的船上，与同学们畅谈自己的抱负，豪迈地说：“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主张“到民间去”。他们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1927年元月，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在晓庄师范最初的招生广告上明确写清了这所学校培养目标：(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在两个月之后的开学典礼上，作为校长的陶行知在致辞中说：“今天是我们试验乡村师范开学的日子，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在这伟大的学校里，可以得着丰富的教育……”陶行知的教育目标，是要建“一个有生命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每天早晨5时有一个10到15分钟的全校短会，师生轮流主持。先

唱陶行知填词的校歌《锄头舞歌》，继而安排当日的学习和工作，会后是早操。上午主要是读书，书目一部分由学校指定，一部分个人自选。下午是工作时间，内容有田间劳动、简单的工艺制作、校外社会实践等。晚上是平民夜校活动等。用陶行知的话来说，这样的教育，是“打破装饰品的教育”。

顺便说一下，创办晓庄学校的陶行知，既是中华职业教育的最早的发起人，也是中华平民教育会的重要成员。这也从侧面说明，看似“一盘散沙”的民国教育并非毫无体系，反倒是因为没有权力的干涉，教育保有独立，才有了如此多元丰富的格局，各个阶层，各类人才，只要有向学之心，总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问学的场所所在。

大厦毁了，可以重建，但教育的毁灭会浪费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甚至会毁灭一个民族的未来。只有权力能够认识到权力之短，将教育还给教育，钱学森之问才会终结。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但愿这美好的企盼不会是镜花水月。 ❀

[【返回目录】](#)

荣剑：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 [中]

[被采访者：独立学者荣剑，采访者：FT 中文网编辑王昉。本文为 FT 中文网“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专题文章之一，首发于 2018 年 8 月 1 日 FT 中文网]

三、国家主义是现在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

FT 中文网：在中国目前盛行的几大主义中，想请您重点谈谈国家主义。它是怎样酝酿发展成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的？

荣剑：国家主义是这个体制与生俱来的一个主义，极权主义都是国家主义。我在跟马国川的一个对话《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中，提出了无限国家主义（也叫绝对国家主义）和有限国家主义这对概念。所谓绝对国家主义，就是国家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国家把所有的社会资源都控制起来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体制，苏联原来的体制，都是绝对国家主义。国家不仅控制着物的生产，在中国做得更极端，连人口的生产也被计划了。

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到相对的或者有限的国家主义。90 年代以来，国家 (state) 借助市场的力量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让执政党取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发展空间，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掌握了巨大的资源。这涉及到我们对“中国模式”的一个基本判断：国家主义在“中国模式”里达到了历史上从没达到过的高度，它的发展动能，以及巨大效率，的确被充分开发了出来。

国家主义不是从新左演化而来，而是新左主动投靠到国家主义上去了。新左并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国家主义理论纲领，对于执政党来说，它也没有明确打出国家主义的旗帜，明确主张国家(state)至上。事实上，国家主义主要是一个制度安排，是一个国家全能控制系统，包括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由国家主导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

张五常在 2008 年总结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经验的时候，写了一本书——《中国的经济制度》，里面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县际竞争说。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来自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相竞争，就是说，中国经济源源不绝的动力来源于两个轮子，一个是市场化的轮子，另一个是政府的轮子，也就是各级政府间的充分竞争。举个例子，我今天接待了一位客人，他是一个县招商局的驻京办事处主任，主要工作就是招商引资。在欧洲，没有一个政府需要干这种活，只有中国的政府在干这个活，把招商引资作为一个主要的绩效考核指标。政府给这个年轻人的指标是，一年要完成 3 个亿的招商任务。当每一个县每一个市都在这么竞争，这个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多大？

但是，国家主义也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秦晖讲的“低人权”。在德国修一条公路，修了十年没修下来，我们五年可以把一个一个高铁干出来。到处都是强拆。所以说，国家主义能发挥巨大的动能，带来很高的效率，但也会产生严重的问题。这给全世界学者带来了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科斯教授原来是很欣赏张五常 2008 年的这本书的，给了很高的评价。但几年后，科斯与王宁合写的《变革中国》，提到了边缘革命的问题，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来源于四种边缘力量的推动，而不是政府主导的过程。后来我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了一篇书评，充分肯定了科斯教授提出的边缘革命论，并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我认为，执政党没有一套关于改革的设想，也没有关于改革的理论，只是改革走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批准了。因此，当时的改革其实是“实践突破理论”，而不是“理论引导实践”，邓小平应该是“总批准师”，而不是“总设计师”。

FT 中文网：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仍然在“摸石头”，其实还没有为这 40 年的发展总结出一套理论？

荣剑：本来，通过 40 年的改革，我们是可以总结出一套理论的，比如对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肯定。国家主义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动能，正是借助了市场的力量，但由此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主要就是权力和市场发生配置时，出现了权钱交换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长处在这个地方，它的弊端也在这个地方。

现在的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掌握资源最多的一个国家机器。它动员和开发资源的能力太厉害了。去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个演讲，题为《山重水复的中国》，里面我试图解释，共产党在大概率要崩溃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崩溃？“中国崩溃论”在西方流传很久了，2002 年时章家敦就第一次讲中国即将崩溃，到 2016 年，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二号人物沈大伟又出来说，中国即将崩溃。当然沈大伟后来做了一个说明，他说中国的确要崩溃，但大概还需要三十年时间。我就批评他，这话等于没讲。我在演讲中提出了分析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四重概念：合法性、正当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我试图用这四重概念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的问题。

就合理性和有效性而言，国家主义具有其他主义难以匹敌的比较优势，因为它把所有的国家资源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高铁，从经济绩效来看，的确是个奇迹，五年就干了出来。我们坐高铁的时候，的确能感受到国家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改进。

FT 中文网：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我们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得益者？这个大轮子碾压过去的人，比如失地农民，不会这样想吧？

荣剑：对中国改革 40 年，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就是财富总量是极大增长了。当然它的分配结构有巨大问题，少部分人占有了 80% 或者 90% 的财富，而 80% 到 90% 的人大概只占有了 10% 的财富。但我认为，总体上看，不同的社会阶层，程度不同地受益了，还是搭上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了。这个需要实事求是。就是说，这个制度安排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

但是，正如我在哥大演讲中所说，它的有效性正在衰竭，它的合理性正在变得不合理。比如说，原

来倡导党政分开，这个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合理的，是一个进步，但现在又重新走上了党政合一的路，党的制度取代了政府的制度。再比如，原来国企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了，现在国企索性变成党企了，变成一个更大的问题。所以说，国家主义原有的比较优势正在衰竭，如果没有再进一步的改革，或者说不继续遵循市场化的原则来处理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它会走向它的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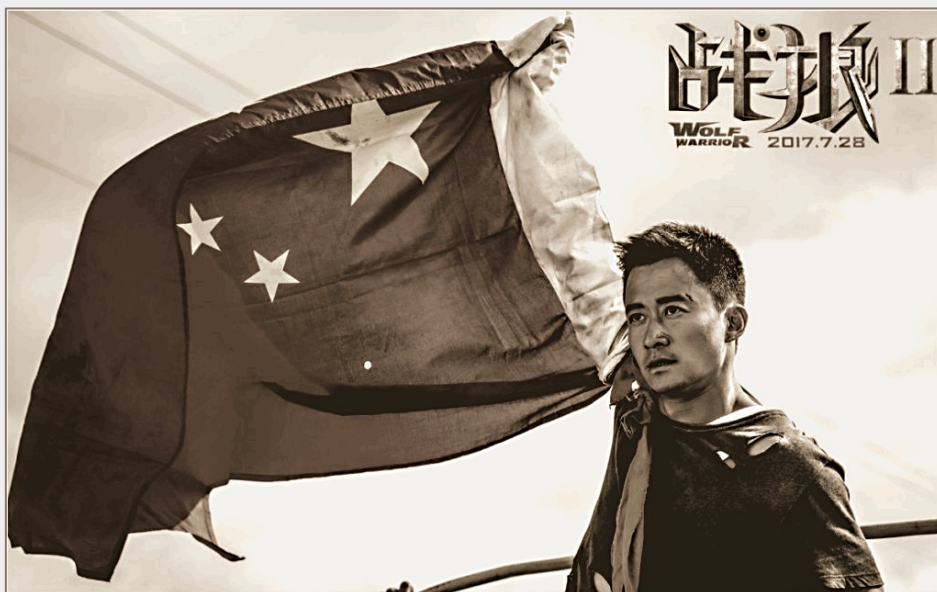
我认为中国眼下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就是国家主义带来的，它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国家主义作为一个最强大的话语，学术界思想界的争论，都要受制于它的逻辑。一方面，它会排斥自由主义的话语；另一方面，它会充分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和儒家的一些东西，把它们吸收进话语系统里，进行分工合作。通过儒家出面，来解决一个和传统对接的问题；通过新左派来跟国际上的左翼势力对接；再通过民族主义来调动民间的情绪，通过民粹主义来发动底层民众或愚弄民众。通过整合这些不同的主义，在国家主义的系统中，聚集起它的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支持力量。

FT 中文网：如果大家都相信它，那么国家主义有什么问题呢？如您所说，水涨船高，无论哪个阶层都是受益的。欧美很多国家里，一代过得不如一代，但在中国，还是一代比一代富裕。中国的城市中产们到国外去，消费毫不手软。中国人都满满的自豪感。这样又有什么问题？

荣剑：所以说，国家主义问题是个大问题，当美国人在喊中国要崩溃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支持这个国家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大得惊人。我哥大的演讲里就讲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把价值判断放在一边，看两个调查数据。一个是瑞信的调查，认为中国有 1 亿中产阶级，另一是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说中国有 2 亿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标准是人均财富 24 万美金。不管取哪个调查数据，肯定都还是保守的，因为很多中国人的财富是很难调查清楚的，但这两个调查数据已经很惊人了。这些年，出国购买的主体已经不是那些所谓土豪了，而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他们在国外的消费程度，已经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千禧一代结婚时，两边家庭一支持，就把房子买了。而在欧美，年轻人都租房子，五六十岁以后才可能买房子。去年我参加中学同学聚会时就发现，跟五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年前，中学同学中有私家车的还是少部分，五年以后，私家车已经很普遍。

这些情况表明，国家主义就像鸦片一样，大家都吸得很过瘾。从普通国民到国家领导人，似乎都支持这种制度安排，连海外的一些学者，包括弗朗西斯·福山这样的人，也已经被中国的发展所折服了。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本书，完全是按照中国的发展模式来写的，先讲国家能力，再讲法治政府，最后讲负责制的政府，参照的是中国的经验。整个西方政治史的写作，一般都是从古希腊开始写，到中世纪，再到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德国道路，这被西方主流政治学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叙述框架。但福山却从国家能力和汉代开始讲。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对一些顶级西方学者造成了巨大冲击，以至于他们开始怀疑民主宪政制度的有效性了。至少他们认为，民主宪政或许解决了公正的问题、自由的问题，但没有解决效率的问题。而在中国呢，没有民主也没有公正，但有巨大的效率。现在不光是日

本左翼学者、英国的新左学者，包括欧美的整个左翼，都和中国的左翼打得火热。中国新左和国家主义的全面合作，在欧美左翼看来，似乎不再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中国巨大的国家力量，让他们陷入在迷茫之中。



2017 年上映、票房问鼎内地的影片《战狼 2》，被视作将民族主义情绪推向极致之作

国家主义最后在中国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它会不会被一个新的制度安排所取代？我们现在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突破口。

FT 中文网：您是说，国家主义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如果它崩盘，代价可能高出我们预期？

荣剑：国家主义的整合一旦失效，它崩溃所导致的代价，和现在国家主义在运行过程中社会付出的代价，可否做一个比较？很难比。我曾在《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一文中，提出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五个重大约束，分别是现有权力格局的约束、现有利益格局的约束、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约束、传统治理模式的约束，以及民族问题的约束。一旦这个控制系统失效，会出现什么情况？比如新疆独立、西藏独立，汉人能不能接受？我想只有少部分人可以接受。你现在跟企业家交谈，他们最要求稳定，只要现有制度不侵犯他的权利和人身安全，他就愿意接受这个制度，谁当总统还不是当？

这么说，并不是说要为国家主义辩护，我对国家主义仍然是持批判的立场。但我认为最好的路径，还是执政党内部改革，就是 80 年代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曾经畅想想要延续 80 年代。这种路径，对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来说，可能是成本最小的改革路径。

FT 中文网：您认为最优路径仍然是执政党内部改良。假设我们实行一种更开明的一党专制，中国能实现现代社会转型吗？

荣剑：对于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我提出过三个分析框架。第一个是刚才提到过的关于中共执政合

法性的四重分析框架。第二个分析框架，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理论。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形态的转型已经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殷周之变，从商朝到西周，建立了封建制，第二次社会转型是周秦之变，建立了帝制。现在是现代之变。殷周之变，我们搞不清楚它持续了多长时间，但周秦之变——从春秋时代封建制开始崩溃，到秦帝国建立，再到汉承秦制，确立帝国模式——大概用了 500 年。眼下的现代之变呢，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讲需要 200 年，而我说大概要 300 年。从 1840 年洋务运动算起，现在过了 150 年，只过了半程，还需要 150 年。不过互联网的出现，可能会加速这个过程。

我们对未来发生的事情很难作出判断，但可以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出分析和判断。基于一个大的宏观分析框架和长时段来看问题，必须从现象形态下面寻找到更为本质性的规定。历史的突变是无法预言的，国家主义的体制，即使非常强大，也有可能在一个早晨就发生巨变。这类实例不少，但似乎无法进行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在一个国家可以发生的制度转型，并不一定会在另一个国家同样发生。这是对未来的困惑。但对历史和当下，研究者应该有责任提出一个可靠和有效的分析框架。在分析和认识国家主义的制度现象时，我谈到了它的合理性、有效性，看到它有着其他制度所无法比拟的比较优势，但是我同时也看到它积累下来的诸多问题，当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总爆发时，一定会产生的巨大能量，以致任何人都无法控制。

国家主义的制度转型，我们经常会参照历史上帝国转型的三个历史版本，一个是法国大革命，一个是苏俄革命，一个就是中国的晚清革命。我在评论金雁的《倒转红轮》这本书时就说过，历史上这几次超大型国家转型所提供的历史经验，都无法用来有效解释我们当下的现实。比方说，拿当下中国和晚清比较来看，晚清时中央已经失控了，士绅阶层已经相对独立了，底层已有动员了，但当下中国没有这些要素。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世界最庞大的国家机器，掌握了全世界最多的资源，这是晚清所没有的。

我在哥大演讲中提出了三个迷：中共在大概率不能取得政权的情况下，为什么取得了政权？在大概率下要崩溃的情况下——从 1957 年看似乎就要崩溃，彭德怀说了，幸亏中国工人农民好，否则都上街了；到了文革，中共历史决议也认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直至今日，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和潜在危机——为什么没有崩溃？第三个迷是，中国在大概率应该完成政治转型的情况下——按照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城市化程度，全球化的外部条件，加上改革 40 年的经验，几乎具备了和平转型的所有要件——为什么还是没有完成政治转型？在 2012 年时，许多人预言未来 10 年内有可能会完成政治转型，但现在谁敢下这个结论？这些都是挑战。

四、“新时代”中国：新威权还是新极权？

FT 中文网：您对中国社会今天的性质如何界定？清华的郭于华老师认为中国已经从“党国”变成了

“党社会”，党渗透入一切生产生活，与社会融在一起。您是否同意？“党社会”是国家主义最极端的一种形式吗？

荣剑：我不大同意郭老师的这个看法。这是基于我对中国的第三重分析框架，也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是我从1983年做硕士论文以来，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一个研究课题。

国家和社会存在着三个关系。一是社会决定国家，就是说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的委托，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国家政权(state)；二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国家和社会是有各自明确的边界；三是国家和社会的统一，是指国家权力重新回到社会，社会自治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把原来委托给国家的权力逐步收回来了。现在很多欧美国家都是这样，社会高度自治了。

从中国最近40年来看，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程度的确是越来越高了。改革前，国家和社会融为一体，国家控制着社会的所有领域；改革之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社会自主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大，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国家在超常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的巨大的活动空间。一方面，党和政府的权力系统对市民社会的介入和干预，依旧司空见惯，比如对国民思想的控制，对国民言论的控制，对国民私权利的控制，对国民人身权利的侵犯，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40年改革的一个重大成就，还是基本完成了国家和社会二元化，主要由市场机制所支配的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独立性日趋加强。由此造成了一个局面，国家的超常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各自处在两个轨道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可以面对面地讨论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我们在酒桌上可以自由地议论国是，我们可以自由地旅行迁徙。尽管有户口制度的约束，但是你还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地流动。改革开放带来了两个资源的解放，一个是土地资源的解放——当然土地资源的大头被国家拿走了，但还是给很多国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还有一个就是人力资源的解放，人力可以自由流动，农民可以进城，原来的身份限制被彻底打破了。你或许不知道，在文革时，我到地方去旅行，是要开介绍信的。因此，在国家主义发展的同时，市民社会也发展起来了。私有财产已经高度膨胀，民营企业占据了国家财富三分之二的份额。尽管国家侵入市民社会的事件还在不断发生，包括一些恶性事件，但市民社会的自我运行的机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边界也有了，人身权利的安全保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也被宪法所认可。

所以，在我看来，党（国家）和社会完全融为一体的情况，从改革以来，不是强化了，而是弱化了。虽然目前出现了大规模的倒退现象，不断地出现国家权力侵入市民社会的各类事件，比如非法拆迁、非法没收私人财产、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如果这些事件日趋普遍化和常态化，国家权力或者党的权力开始大规模地全面地进入市民社会，完全由权力机制来取代了市场机制，那个时候才可以认为从“党国”状态进入了“党社会”状态，党代表国家剥夺了市民社会的一切权利，国家和社会从二元化状态重新退回到一元化状态。这对中国而言，当然是一个灾难性的状态，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党国”体制或许已经形成，“党社会”体制则未必能够形成。现在“党国”要想全面侵入市民社会，彻底恢复中国文革前实

行的绝对国家主义体制，几乎没有可能。

FT 中文网：虽然没有倒退到那一步，但国家权力似乎已经成功地把我们都打成了原子化的个体，公民社会的成长空间被严重挤压？

荣剑：除了政治权利、言论权利以外，我认为中国市民社会的一些基本权利还是客观存在的，是受法律保护的。从人身自由到财产安全，从自由择业到自由置业，包括受教育的权利，可以出国留学——这是开发民智的重要途径，可以自由地到国外旅行，等等，这在绝对国家主义体制下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政治权利和言论权利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权利。你不讲话怎么行？但是在市民社会这个领域，当局对言论空间是无法彻底控制的，比如我们今天可以做这样的讨论，比如我在出租车上可以听司机骂政府，比如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调侃段子。这在文革期间也是根本没法想象的。那个时候才是党的权力和社会高度融合。国家，或者是党，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把社会整体控制起来，导致了在东德时期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告密者。文革时期，你在家也不能自由地讨论公共问题，因为连家人都有可能向组织去汇报。现在我们可以饭桌上自由地讨论问题，我们可以在出租车上讨论问题，哪怕在大街上我们骂一下国家领导人，警察听到也不会把你扣起来，是吧？可能他心里也有这个想法。

国家主义体制之所以在中国还没有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从国家的控制下独立出来之后，大大分流了政治上相当一部分压力，把它们分解掉了。90年代初期，如果说没有市场经济这一个领域被打开的话，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政治领域，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政治矛盾，那执政党肯定早就承受不了了。比如说我吧，89事件之后，学校对我的事情处理完了，剥夺了我的博士答辩资格和工作的权利，迫使我只好在1990年7月份去了海南。当时很多人都去海南了。80年代的一批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因为受到了当时的政治冲击，有许多人选择下海了。这个普遍性的选择实际上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政治压力给消解掉了，推动中国从政治时代进入到一个消费时代。接下来的20年，中国为什么没出大事？就是因为这一批政治精英全跑到市场领域去了，不在政治领域折腾了。直到在市场领域又出现新的问题时，当这些新问题又在压迫他们时，他们才重新开始来思考这些问题，政治压力又重新聚集起来。

因此我的看法是，执政党如果不充分发展市场经济，不充分发育市民社会，只能导致它受到的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把市场的空间打开越大，越开放，政治压力反而越轻。一方面，它可以由此获得政治合法性支持，经济上的发展可以换来它的政治生存空间和时间；另一方面，从技术策略上来讲，也很好啊，至少是把政治压力消解掉了，让潜在的政治反对派都成为商人了，政治压力不就减轻了吗？！因此，可以这么说，市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能够在一段时间里保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相对平衡。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只要国家不侵入到市民社会的基本权利领域，可以保证市民社会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保证市民社会的教育迁徙旅行这些基本权益，市民社会可能会让渡出政治权利

和言论权利，市民社会可能会私下批评国家，但不会公开转化为一种针对国家的政治抗议行动。

国家目前完全是在限制公民社会建设，公民社会建设究其实质，是一种政治建设，公民诉诸的基本权利是政治权利，比如要求民主、法治和实现公民的结社、言论、宗教信仰、罢工、游行、示威等项权利。实现这些公民权利，当然意味着党国体制的根本性改变，由此受到极大的阻力，完全是可以想象到的事情。在所有转型国家的历史中，限制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威权国家的天然反应，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公民社会建设在中国所遇到的种种限制。但是，如果以限制公民社会建设的方式来限制市民社会的发展，甚至完全消灭市民社会所应有的基本权利，那意味着市民社会只有两个选择，或者甘愿为国家的奴隶，或者不甘愿为国家的奴隶而起来革命。

FT 中文网：想请您再分析一下新权威主义的现状。它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潮，而您与它有很深渊源。80 年代新权威主义首次被提出后，引发巨大争议，您深度参与了那次争论。

荣剑：1989 年围绕新权威主义的争论，是 80 年代中国思想界最大的一个公共事件，也是 80 年代影响最大、最广泛的一个争论，甚至影响到了八九事件。争论是在我和吴稼祥之间首先展开，时间是 1989 年 1 月 16 日，这一天的《世界经济导报》——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同时发表了我和吴稼祥的文章，吴稼祥主张新权威主义，而我则是反对新权威主义。借助于《世界经济导报》的巨大影响力，我和吴稼祥对于新权威主义截然不同的看法，迅速扩展成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径，是走新权威主义之路，还是走民主主义之路？我是坚持民主主义的，1989 年 1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好出版了我的政治学专著《民主论》，这是中国自 1949 年以来首部关于政治民主的著作，民主对我个人而言，是最重要的价值导向。施滨海曾经告诉我，我在 2012 年重新出来，写了很多文章后，吴敬琏老先生对他讲，很高兴荣剑现在回来了，他可是反对新权威主义的主干将。这或能说明，有关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已经成了中国知识人抹不掉的共同记忆，吴先生对我的赞许，是基于中国知识人对民主价值的共同认可。

FT 中文网：在最近几年的政治气候下，新权威主义是否终于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可以被用来解释很多高层进一步集权的动作？

荣剑：新权威主义在 1989 年被首次提出来时，曾经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邓小平跟赵紫阳讲，他同意这个观点。实际上这是个谣传，邓没有说过这个话。对执政党来讲，它是不可能理论上承认新权威主义，公开将它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为表面上执政党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它怎么能搞什么新权威主义呢？新权威主义在执政党的理论谱系中是没有合法性的，不符合它一贯倡导的政治正确。正因为此，首先提出“新权威主义”这个词的萧功秦教授在支持重庆模式时，又创作出一个新概念“新保守主义”，来取代新权威主义的提法。我批评他说，重庆的薄熙来怎么可能用新保守主义这个概念？他

保守什么？共产党一直以改革派自居，怎么可能愿意戴一顶保守主义的帽子？！保守主义是一个完全西化的概念，套在中国的现实上，岂不是不伦不类？你可以说它是新民主主义，也可以说它是新社会主义，但绝不可说它是新保守主义。政治词汇的运用对执政党来讲是非常敏感的，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出发，执政党不可能公开承认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这类概念。

在理论上不承认新权威主义，并不意味着执政党不会在实践中实行新权威主义路线和政策，在实际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可以用学者们所说的新权威主义的那套标准来进行对照，看看其是否按照新权威主义所设计的路径前行。针对当前的形势，许多学者都在问，中国当下和未来究竟是新威权还是新极权？如果是新威权，那未来的目标还有可能转向宪政民主，新权威主义制度不过是人们可以忍受的一个过渡阶段；如果是新极权，那新权威主义所设想的宪政民主就会变得遥不可及。

2014年，萧功秦教授在用新保守主义概念取代新权威主义概念不过三四年之后，又重新打出了新权威主义的旗号，认为新权威主义的2.0版开始了，用我批评他的话说，新权威主义的灵魂附体了。但萧功秦并没有说明，新权威主义的2.0版比它的1.0版究竟先进在哪里。如果说，从邓小平强力推动改革以来，中国改革的运行都是在新权威主义的轨道上，为何在改了40年之后，新权威主义体制还没有向民主转型的任何迹象？居然还要升级到2.0版？这是不是意味着新权威主义以后还会有3.0版甚至4.0版呢？萧教授显然不想回应这些质疑，事实上，他也回答不了这些质疑。

在复杂的现实面前，理论和概念总是苍白的，不管是新极权还是新威权的概念，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的制度安排时，总是会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就新极权而言——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现行制度的性质就是一种新极权主义，我对此并不这么看。如我前面所述，极权主义意味着是一种绝对的国家主义体制，国家全面控制着社会的所有领域，但现行制度并没有达到全面控制社会的程度，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仍然是主要的社会结构，公民社会建设遇到重重阻力，市民社会却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当前的制度安排，有所谓新极权主义的要素，也有所谓新权威主义的要素，何种概念更适合用来描述现行的制度安排，似乎都不尽然。因此，与其被概念捆住手脚，不如放开这些概念，建立起一个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来对现实的制度安排进行深入分析。

FT 中文网：这么说来您还没有结论？

荣剑：不是没有结论，而是没有能够高度概括中国现有制度性质的概念，或者说，我反对用新极权主义或新权威主义来定义中国的现有制度。其实，我在分析中国现有的制度安排及其性质时，除了建立了我前述的三重分析框架之外，我使用最多和最有效的概念还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两个形态：绝对的（无限的）国家主义和有限的国家主义，足以用来说明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制度安排及其演变。现在可以判断的是，中国目前仍然处在有限的国家主义体制中。

五、中国与外部紧张关系加剧国家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FT 中文网：中国跟外部世界的关系最近变得异常紧张。很多人抱希望于这次中美贸易战，希望它能倒逼中国深化改革。您有这种期待吗？

荣剑：通过外部压力来倒逼中国的内部变化或改革，这是许多人的一个共识。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的分析模式，对于当下的中国仍然是有效的。从近代以来，如果没有巨大的外部压力，中国晚清可能还在延续，就算晚清结束也会再进入一个新的王朝。日本也是这样，若没有黑船事件，怎么会有明治维新？东方这种社会结构，依靠的是一个自治的封闭的系统，如果没有巨大的外部压力，可以按照原有的轨道和原有的逻辑一直继续下去。

中国目前面临的外部压力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是前所未有的。89 事件之后，美国人担心中国会把已经向世界打开的大门重新关起来，所以他们主动和中国恢复接触，派特使来中国和邓小平谈，不是施加压力，而是给邓小平继续改革开放的动力。那个时候，中国很容易再把大门关起来，况且和苏联关系已经正常化，中国重新回到旧体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外部压力越大，回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现在不一样了，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要回到旧体制，回到绝对的国家主义体制，首先遇到的阻力是来自于国民的抵制和市民社会的反抗。现在中国每年出国旅行的人数有上亿之多，出国留学的学生大概总有上千万了吧，这个时候，谁把中国的大门重新关起来，谁就是人民的公敌。谁敢这么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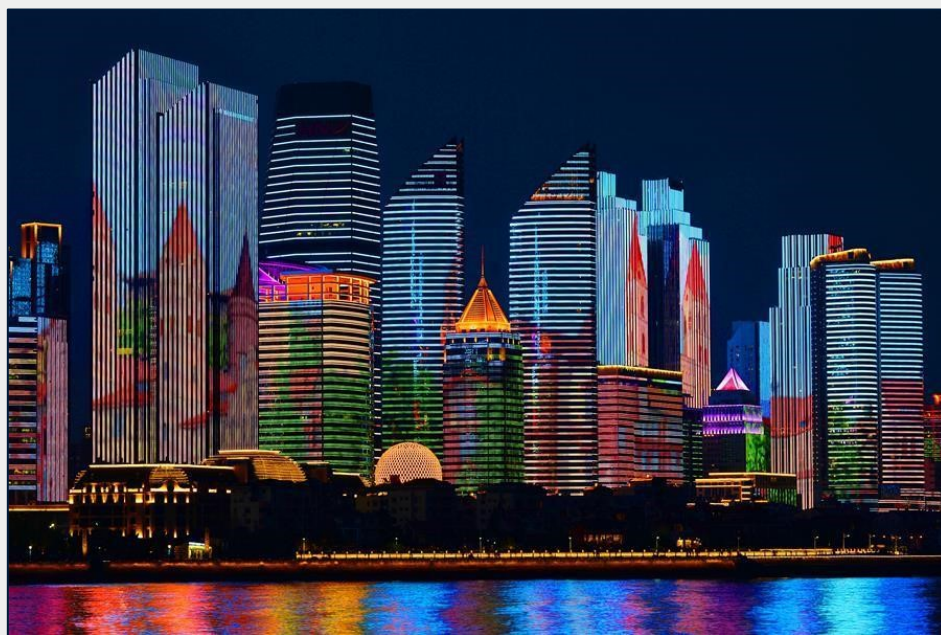
正是因为中国对外开放已经不可逆转，中国就必须承受巨大的外部压力对内部的冲击，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和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经济联系与交往，意味着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再幻想构筑可以阻隔中国和世界的万里长城，那是痴心妄想。面对这些逃无可逃的外部压力，当国者如何决断？聪明一点，借助外部压力，主动因势利导完成内部改革，把挑战转化成一种发展机会，这大概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相反，如果面对压力来个高筑墙、深挖洞，重建一个封闭系统，靠耗费内部资源来抗拒外部挑战，一定会出现难以预见的可怕后果。中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毕竟经历了 40 年的改革开放，民智已经开化了，已经从一个争取民生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争取民权的阶段，基本的权利主张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就在过去半年里，出了多少问题？我们可以预料，在这种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主动变，还能掌握一些主动权；被动地变，很难预料它的结果。

FT 中文网：大概在 2008 年到 2010 年，“中国模式”的说法在国际上非常流行，当时还有“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说法。10 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显得相当孤立。这次争端表面上看是贸易战，但骨子里应该还是制度之间的冲突。您觉得中国模式还有希望胜出吗？

荣剑：中美之争从表面上看，是贸易之争，从深层上看，是制度之争和价值观之争。福山讲过，未

来的发展过程，是美国更像中国呢，还是中国更像美国？他还是很清醒的，坚信中国会更像美国，尽管他对中国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有一种“羡慕嫉妒恨”。就国内的各个阶层而言，对美国的偏好程度可能不一样，但我相信他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上学，更不用说那些权贵家庭早已经完成了向美国移民的行动了。现在世界上的制度和价值观之争，就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展开，以前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展开。两大制度之争的结果是，苏联解体了，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中国难道还要重蹈苏联的覆辙？

中国的国家主义的确是在 2008 年到 2010 年达到高潮。2008 的奥运会和 2010 年的世博会是中国国家主义的两场盛宴，当时大家都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狂欢之中，连我自己当时也有这样一种感觉，啊，中国真厉害。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拿出 4 万亿一下子给解决了，充分体现了国家主义在应对重大危机时候的应变能力和高效力。我们在身临其境的时候，会被国家主义的巨大能量所感染。现在不一样了，谁还会陶醉在国家主义所制造出来的宏大气象中？从前年杭州的 G20 峰会，到去年厦门的金砖会议，再到今年青岛的上合会议，场面极其宏大，极尽奢华，挥霍无度，但国民的反应是什么？几乎都是骂声一片，民意已经高度不能容忍这种做法，当国者还指望用这种制造出来的盛世气象来焕发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中国梦，那真是不知今夕为何年了！



2018 年 5 月，青岛上合组织峰会期间，被灯光照亮的建筑群

再往回看，在 2002 年，章家敦说中国即将崩溃，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不是扯淡嘛？当时我哥哥从美国打电话，问我有这可能吗？我说怎么可能！当时有许多美国学者也认为不可能，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在 2003 年写了一篇文章，对中国即将崩溃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的制度还很有韧性，有调适的能力。2010 年是个转折点，国家主义在这一年达到高点，之后就往下走了。一个原因是重庆模式。重庆模式的崛起与崩溃加速了国家主义的破产。新左派由于和重庆模式深度捆绑在

一起，导致他们一个重大的学术危机，信誉被严重透支。重庆模式崛起以后，也引起了西方人的警惕，因为它太过分了，国家主义回到了红色传统，进行红色总动员了。重庆模式破产之后，大家似乎松了一口气，以为红色复辟不过就是昙花一现。没想到的，重庆模式并没有死掉，它从一个地方性实验成为一个全国性现象。从 2012 年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化，表明人们的善良预期根本无法想象国家主义的恶性病变会以怎样的方式出现。

当国家主义的力量不仅试图扭转中国的改革进程，而且还试图改变国际秩序和国际主流的价值观时，那毫无疑问的一定会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警惕。美国朝野共和民主两党，美国左中右派，美国亲华反华派，前所未有地对中国达成了共识：要采取一切措施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的价值观在世界范围的扩张。邓小平原来确立的“韬光养晦”的国际政策，为中国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和高速发展的 20 年，而美国人似乎也乐意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发展，共享美国的丰富资源和经验，他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日趋融入到世界体系中，中国会发生向民主方向的转变。但中国现在面向世界的态度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中国非但没有转向民主，而且还要用自己的方案来改造世界，这不能不让美国人集体警醒，他们感觉上当了，被中国忽悠了。中国在和美国的百年马拉松竞赛中将要超越美国时，美国采取行动了。

中美 20 年的合作终结了？中美对抗开始了？世界新的冷战又要来了？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越来越沉重的外部压力。中国的内部问题积重难返，中国的外部压力接踵而至，在内外交困之下，国家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如何化解？中国的制度如何演变？

谁知道？天晓得！ 🍷

[【返回目录】](#)

周其仁：改革的逻辑

[周其仁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本文节选自周其仁著作《改革的逻辑》作者自序]



本文作者周其仁教授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6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

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改革的逻辑》 周其仁 著
中信出版社 2013 年 8 月出版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 1959~1961 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 80 后、90 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得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

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地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

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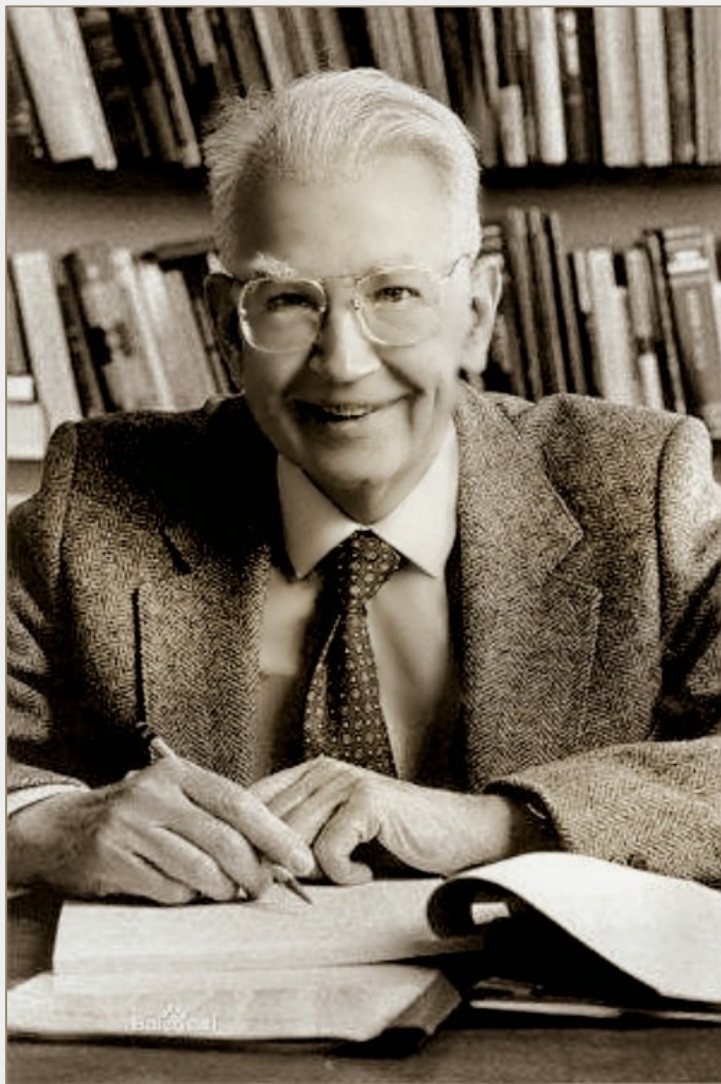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

[【返回目录】](#)

盛洪：“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罗纳德·哈利·科斯 [Ronald Harry Coase 1910.12.29—2013.9.2]

经济学家，交易成本理论、科斯定理与科斯猜想的提出者，对产权理论、法律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有极大贡献，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者按：回想起 10 年前在芝加哥。那时科斯还在。现发当时旧文。

当中国各界纷纷开会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时，7月14日到18日五天时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了一次极为特殊的研讨会。这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大师罗纳德·科斯倡导并实际资助的会议。科斯基金会为这次会议出资四十多万美元，将近诺贝尔奖金的一半。共有四个诺贝尔奖得主，除了科斯本人外，还有道格拉斯·诺斯，蒙代尔和福格尔，参加了这个会议。新制度经济学的

大将哈罗德·德姆赛兹自始至终积极参与了这个会议，另一员大将张五常则通过 DVD 发表了演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把他这些年对中国改革的体会和理论创见做了集中表述。

国内共去了包括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约 50 人，他们从各个角度对三十年的改革进行了描述、分析和解释。科斯教授除了事先就仔细阅读了论文以外，也几乎每天都参加会议，尽管由于太过劳累而没有全部参加。但在中午吃饭时，还是把当天发言的人请去一起就餐谈话。晚上也邀请各路人马，如中国去的经济学家共进晚餐。



科斯教授已经 98 岁高龄，组织一次会议极为艰难，但除了出资外，他几乎是靠他与中国的个人人脉关系邀请了与会人员，协调会议日程，在没有一个专业的机构或会议公司承担会务的情况下，成功地举办了这次会议。为什么在近百高龄，科斯教授要不畏艰难召开这次会议呢？

在会议结束时，科斯教授做了总结发言，这很像是一次世纪总结。他说之所以想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使我感到极为惊讶。”而“如果不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就会误解中国；如果我没有听到改革参与者们在这次会议中讲的很多情况，我就不会理解中国。”其实，他一直在关注中国。科斯教授说，“相当长时间里，我一直相信中国的未来。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读马可·波罗。我从中发现的，令我神往。那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国家。”从他的中国朋友那里，他了解了不少中国改革以后的情况。也许最多的信息来自张五常。在本次会议的演讲中，张五常对三十年改革的高度赞扬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也许命中注定他只能永远与中国隔海相望。记得 1994 年科斯教授接到了中国国家体改委的邀请，我当时正在他那里作访问教授，就鼓励他接受邀请，但他说他岁数太大了，不宜去这么远的地方。然而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理由。后来他的朋友接二连三地访问中国。如德姆塞兹，蒙代尔和诺斯等人。其中蒙代尔还获得了北京市荣誉市民资格。诺斯教授现在也有 87 岁高龄，却每年至少来中国一次。有些因素使科斯教授错过了访问中国的较好时机。如今再奔波这么远来到中国，也许就太冒险了。

当我们与科斯教授共进晚餐时，我问他是否因为没有到过中国而遗憾，他却截然地回答说“不遗憾”。也许真的不遗憾。对于科斯教授来说，“中国”是一个遥远而神秘国度的代名词，他需要用这个代名词来寄托他的梦想。20 年前，在纪念“企业的性质”，他的一篇天才论文发表 50 年时，他说“我想再度扬帆起航去寻找通向中国之路”，实现他的“老年人的梦想”。而在今天，“中国”可能已经远远超出比喻的范围。因为一个真实的奇迹发生在了寄托梦想的地方。但是，还是保持一点神秘感吧。

为什么一个美国人不做美国梦，而做中国梦？科斯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接着说，“我生于 1910 年，那时工业革命在欧洲已进入尾声，社会体系看来稳定；但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战争爆发了。那是一场愚蠢的战争，除了破坏一无是处，女人和男人被杀死，人们失去了对那种社会体系的信心，于是共产主义降临了。”在科斯教授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苏联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后来的表现使他转变了看法。但他似乎省略了对这一段历史的回忆，就接着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伟大的情境之中，一切似乎都发展得很好。”他显然是在指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的成就。为什么科斯教授对中国的成就如此兴奋？我们猜，是因为他童年发生的那场愚蠢战争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导致这种愚蠢战争的因素还存在。解决的办法是另辟溪径。要市场和产权，但是不要战争。也许中国能做到？

科斯教授是这样想的吗？接下来就没有悬念了：“我真诚相信，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科斯教授对中国的期待为什么比中国人还高？为什么比我这个对中国有很高期待的人还高？在我们知道的西方学者中，很少有超然于诸种文明之上的。也许汤因比算一个。当别人问他想出生在何时何地时，他说他希望出生在汉代的中国的西域。在批判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同时，他赞赏在汉代就形成的中国的天下主义文化。汤因比甚至期待着中国对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在科斯那里，我看到了汤因比的境界。如果一个有着天下主义传统的社会通过产权变革和市场化而兴盛起来，世界的永久和平不就变得更有希望了吗？

不过如同所有远远遥望中国的西方学者一样，科斯难免有对中国的过度美化。当初莱布尼兹，伏尔泰和魁奈这样一些欧洲著名的知识分子都卷入了中国热之中。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把中国描绘为一个遵循自然秩序的完美国度。尽管那时正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高峰——康乾盛世，但中国远没有那样好。当然今天的通讯技术比 18 世纪要好得多。科斯了解中国不是通过传教士的信札，而是通过现代传媒和朋友。也许张五常是科斯获取中国印象的最重要和权威的通道。张五常对当

下中国的赞颂充满了激情，他甚至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不能不增加科斯对中国的信心。

当然科斯的神奇之处在于，他有极好的直觉。1994年当他在与我谈到中俄改革的对比时就说，中国比俄罗斯在制度上优越的地方是家庭，在中国，人民公社解散后还有家庭组织生产；而在俄罗斯，集体农庄解散后就只剩下个人了。对于目前的好势头能否继续，他没有把握，因为“政治机器自己运转，它将如何做为，我不知道。我能做的，就是希望它在今后100年能做好。”科斯教授接着说，“我现在要感谢你们。”似乎一半是对着在场的人，一半是对着他所谓的“政治机器”，因为“将思想变成现实比我行将进入的长眠要难一点。”听到这里，我的眼眶有点湿了。这是一个世纪告别，又是一个世纪托付。

“如果你们兑现你们在这个会上所说的，我会很高兴，实现了这些，会使人民幸福，我感谢你们。”

也许，张五常与科斯是相通的。他希望在中国寻找到更好的制度。只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我们要努力。中国的经济制度确实有了很大改进，我们也希望能把它变成世界最好的制度。同时也要树立信心，在中国探寻出最好的“政治机器”，它至少再有效运转100年。当我从芝加哥回来以后，遇到了一些令人尊敬的人，他们在为改进“机器”做着不懈的努力。也许科斯教授真的直觉很好。

在最后一个晚上，会议又安排在一个中餐馆举行晚宴。我找到机会与科斯夫人说几句话。我祝贺她有一个成功的婚姻，因为科斯夫妇的婚姻是制度经济学界的佳话。在1998年巴黎举行的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奥利弗·威廉森教授说，科斯教授不仅研究制度经济学，而且实践制度经济学。一个明证就是他有一个成功的婚姻。科斯夫人听罢，半是满足、半是抱怨地说，他的丈夫是与经济学结了婚，经常把她抛在一旁，思考自己的经济学问题。之后我又对科斯教授开玩笑说，您的太太说您不是一个好丈夫。他回答说，“从现在开始，我是好丈夫了”。

2008年9月4日于北京森林大第

[【返回目录】](#)

范晔：在群情汹涌的狂热时刻，谁有勇气说不

[本文首发于 2017 年 1 月 2 日《澎湃新闻》]



米盖尔·德·乌纳穆诺 [Miguel de Unamuno 1864.9.29—1936.12.31]
西班牙著名作家、哲学家

1936 年 10 月 12 日的开学典礼上，校长米盖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一开始并未准备发言。

三十六年前，恰好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第一次被任命为建校于 1218 年、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大学的校长，后来因政治原因被政府免职。1924 年被选为副校长，又因抨击国王阿丰索十三世及独裁者普里莫·德里韦拉（Primo de Rivera）而遭免职和流放。到共和国时期重返校长职位，但他又渐渐对总统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任上的土地、宗教政策感到失望，因而在内战爆发初期一度支持佛朗哥的国民军，被阿萨尼亚下令解职但随即被佛朗哥政府复职。1936 年的开学典礼上，七十二岁的乌纳穆诺再次希望幻灭，悔不该当初支持如今的内战胜利者——他们并不是自己想象中西方文明

的捍卫者。就在月初，乌纳穆诺刚刚面见了佛朗哥，为身陷囹圄的好友、门生求情而未果。他还不知道，十天后的学生、格拉纳达大学校长萨尔瓦多·比拉·埃尔南德斯 (Salvador Vila Hernández) 将被枪杀，就在同年 8 月诗人洛尔迦被害处不远的地方。此时此刻，校长乌纳穆诺衣兜里没有发言稿，只有一位女士求他斡旋营救自己丈夫的信件。

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读者已经从《生命的悲剧意识》了解到他是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思想家，从《迷雾》或《殉教者“好人”圣曼努埃尔》了解到他是西班牙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纪念西班牙内战爆发八十周年的今天，或许仍有必要听听乌纳穆诺最后一次公开讲演的声音。

那一年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同列的还有佛朗哥的夫人卡门·波罗 (Carmen Polo de Franco)、萨拉曼卡主教等政要，以及独眼独臂的何塞·米连·阿斯特赖 (José Millán-Astray) 将军——他将因为这一天与乌纳穆诺的对峙而史上留名。那一天是 10 月 12 日，也是纪念“发现”美洲的“民族日”，如今西班牙的国庆日。听到有人将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比作“西班牙身上的毒瘤”，乌纳穆诺终于起身发言：



米连·阿斯特赖将军

.....我知道你们在期待我讲话，因为你们了解我，知道我不会在这种时刻沉默。因为沉默有时候会被理解为默认。.....主教先生是加泰罗尼亚人，而正是他教导你们基督的教义，那是你们不懂得；我是巴斯克人，而我一生都在教导你们西班牙语，那是你们没学会的。真正的帝国（语言）是西班牙语，

那也是黎刹所说的语言，和杀死他的刽子手所说的语言一样……

乌纳穆诺的话被听众激烈的反应打断。愤怒的米连-阿斯特赖将军用他幸存的独臂猛敲桌子要求发言——真正激怒他的是乌纳穆诺提到了菲律宾民族英雄何塞·黎刹（José Rizal）的名字，而米连-阿斯特赖在军中的功业正是从十七岁时赴菲律宾镇压他加禄人的独立运动起始。据说米连-阿斯特赖将军就在此时喊出了那句臭名昭著的口号：“知识分子去死！”以及“死亡万岁！”

将军按当时风行的套路向群众呼喊：“西班牙！”

听众山呼回应：“独一！”

将军再喊：“西班牙！”

听众回应：“伟大！”

将军三呼：“西班牙！”

听众回应：“自由！”

就在长枪党人纷纷向墙上悬挂的佛朗哥像致举手礼，台下一片群情汹涌之际，校长乌纳穆诺继续他的讲话：

我刚刚听见有人喊：死亡万岁！我毕生都在创造悖论而惹恼那些不理解的人，作为这一领域的权威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所喊的是一个荒谬可厌的悖论。……米连-阿斯特赖将军是个战争中负伤的残疾人。塞万提斯也是。不幸的是我们如今在西班牙有太多的残疾人，今后还会更多，如果上帝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一想到会由米连-阿斯特赖将军这样的人来指导民众的心理就十分痛苦。一个缺乏塞万提斯那样伟大精神的残疾人将乐于看到身边遍布残疾人。米连-阿斯特赖将军不是合适的人选：他想建立一个新的西班牙，按照他的形象。所以他想看到的是一个残疾的西班牙……

这里是知识的圣殿而我正是她的大祭司。你们在亵渎她的圣所。

这位校长化用了福音书中耶稣的话，“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位曾把堂吉珂德视为西班牙基督的作家宣告：“我永远是我祖国的先知。”随后便是那句被无数次征引的名言：

你们能以力压服，却不能令人心服（Venceréis pero no convenceréis）。

听到这里，听众中已经有不止一位军官在伸手掏枪。事态一触即发之际，据说是佛朗哥夫人卡门女士主动要求乌纳穆诺校长挽起自己的手臂，陪他安全离场。乌纳穆诺在一片嘘声中回到自己的住所，数天后收到了被解除校长职务的公文，——曾一度力促他申请诺贝尔奖的教授都在上面签了字。他从此被监视软禁，直到两个多月后去世，死在西班牙灾难之年的最后一天。昔年曾为“西班牙欧洲化还是欧洲西班牙化”与乌纳穆诺激烈论争的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得悉他的死讯后写道：“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乌纳穆诺的声音一直在西班牙回响。如今这声音永远沉寂，我担心我们的国家将进入可怕的沉默时代”。

乌纳穆诺在1928年出版过一本小书，名叫《既反对这个，也反对那个》（Contra esto y aquello），

被后世评论者视作作家自身的写照，认为他“思想中充满矛盾”，无论国王、独裁者或共和国，无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都曾加以抨击。



乌纳穆诺最后一次演讲完离场

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Javier Cercas）说自己有一次酒后与朋友狂想完美社会的蓝图，最后一致认为，理想的社会中至少要有三个人：智者，医者，说不的人。智者传授生之道，医者传授死之道，而说不的人则负责在决定社会前途的关键时刻，在群情汹涌的狂热时刻，有勇气说不。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是出于任何利益或虚荣心作祟，只忠于自己真实的想法且言行一致。塞尔卡斯说这就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加缪的反抗者，卡夫卡式的主人公。说不的人，代表着知识人的尊严。我想乌纳穆诺也可以加入这个序列。 🍷

[【返回目录】](#)

傅国涌：教育就是与美相遇——重温民国中小学教育

[傅国涌 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本文首发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6期。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教育是什么？古往今来的教育家，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明白，也许它永远都没有一个最终答案，但今天我想提供一个暂时的答案，教育就是在变化的时间中寻找确定不变的价值。



民国时期的小学生

教育很奇妙，因为它是针对活人的。“活”字，三点水加一个“舌头”的“舌”，水是流动的，语言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人是在变的，时间也在变，教育就是在变化中找到那些相对稳定的东西。中国早期的经典文学作品中传递的价值、情感，跟今天这个时代还是相通的，例如《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讲的是男女情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讲的是人在自然变化中的感触，这些美好的东西具有稳定性，这就是教育要探求的。

教育具有现实性，一定是在现实的人间进行的事业；教育又具有超越性，一定是超越现实而指向某些更重要的精神层面的价值。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人之美”——花开是美的，男女爱情是美的，人间亲情是美的，所有的善事都是美的……美的涵盖面很广。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教育就是要让人类活在美中，活得更美。

在真正的美面前，语言是苍白的。《论语》里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有的美只能让人赞叹，但很难清晰地表述，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与美相遇的过程。科学是追求并利用“真”，哲学是探究并深入“善”，文学艺术是记录并展开“美”，而真、善、美又是相通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教育要指向的目标。



民国时期，上海的小学生在做广播体操 摄于1937年

民国时期的教育，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与美的相遇，它体现在教材、教师和教学的全过程。重温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育，对教育本质会有更深的体悟。民国教育的目标不是要把人塑造成“成功者”，因为成功是没有标准的，而是要成全人，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最好、最美的自己。用美来定位教育的目标是比较恰当的，因为美是务虚的，而中国人太务实了。教育不应该是功利的，一个人将来是否成为总统或富豪，不是在受教育阶段要思考的问题。

课文之美：热爱自然，崇尚亲情

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初小《国文》第一册第一课，就是一个“人”字。一撇一捺是为“人”，从这个字开始，一个孩子进入教育之门，进入的方式是通过家庭的认知，所以插图是一家三代人。第二册有这样的课文，“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用这样的短句写出了《游子吟》中母子间的情感，呈现的是人性之美。

在另一个版本的民国课本中，小学生进入课堂的第一课是“天亮了”，不仅有日出、有雄鸡，就是每片树叶仿佛也活了过来，十分美好。那个时候，中国印制彩色插图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但课本里常常有彩页，让孩子能在有色彩的课文里感受到自然与人文之美。

1923年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有一篇《什么时候好》，讲的是一年四季的早晨，读起来就非常享受。“什么时候好？春天早晨好。看不厌，听不了，园里鲜花树上鸟。什么时候好？夏天早晨好。月光淡，星光小，绿柳枝头风袅袅。什么时候好？秋天早晨好。叶半红，花半老，露像珍珠缀百草。什么时候好？冬天早晨好。雪在山，冰在沼，满瓦霜花白皓皓”。

课文始终要注意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要给孩子想象力。叶圣陶和丰子恺先生合作的《月亮船》是一篇经典课文，“我看见一个月亮浮在天空，像一个小船，我想我坐到月亮船一定更好玩。我坐在船里许多的星，浮在船旁边，我把又大又亮的星放到一只盘里，我想回去送给妈妈，妈妈一定欢喜”。短短的文字里有科幻、有文学、有人性、有亲情，一步步拓宽了孩子的世界。



民国小学二年级辅助课本《大家来比赛》，1936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图片来源：中国收藏热线

民国教科书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一个“美”字。一个人从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第一课开始，读着这样的课文一步步往前，他的世界就是一个健康的世界，他所建立起来的价值是一种健全的、不会失衡的价值。教育给他提供的都是真美善的东西，让他建构起一整套应对世界、应对社会人生的价值观。

课堂之美：教学相长，师德为范

“儿童不知春，问草何故绿”，因为儿童不知道春天来了，所以他会问草为什么绿了，老师就要给他作出解答，所谓的课堂就是有问有答，形成一种对话。我们中国人往往把课堂变成了老师单方面对学生的教导，就失去了教育原本应有的互动状态。

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他们留下最精美的东西都是对话，老师与学生的对话其实就是课堂原始

的样貌。民国的课堂并不是有多么精彩，教师上课相对随意，甚至常常离题。但是过了几十年，老师正儿八经讲述的内容学生可能都已经忘记了，说明那些内容也没那么重要，反而记住了老师即兴的“离题万里”，而那些故事也成了校史中代代相传的佳话。



民国时期的小学生

衡量一个好学校、好课堂、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也可以看有没有故事。如果有，就是一个好学校、好课堂、好老师。课堂要有随意性和生动性，不要拘泥在课堂原本设计的内容上。因为教育是针对活人的，学生的问题也不是固定的，尤其是聪明的孩子，能提出许多老师意想不到的问题。师生之间的互动问答，就能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教育生态。就像丰子恺漫画中出现的杨柳树、青草地、小河边，这就是生态，课堂也应该如此，如同草地上展开的对话。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学生在课堂上 图片来源：美国《生活》杂志

钱穆先生做了多年的小学老师，他回忆自己有一次给小学生上作文课，布置的作文题目叫《今天

的午饭》，把所有的作文收上来后，他把一篇佳作抄在了黑板上。他告诉孩子为什么这一篇写得好？“今天午饭，吃红烧猪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他跟学生说，“说话要有曲折，如此文最后一句”。

陶光先生是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一点师”，原因是有一次一个同学写了一篇作文，开头第一句话是“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他在点评的时候说，能不能在“远远的”后面加一个标点，“远远的，东方，太阳升起来了”，一个标点可以让整个句子活起来。陶光会教作文，这样的点评能给学生带来无穷益处。

南开中学的孟志荪老师，学生回忆他讲庄子的《逍遥游》，一上来三句话：“孔子抓住一个‘仁’，孟子抓住一个‘义’，庄子什么都不抓，而他拥抱了全世界。”精辟的几句话，一下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进入《逍遥游》的世界里去了。孟老师更有一手绝活，他给学生批作文、考卷从不判甲乙丙丁，都是批某一首诗里的某一个句子。学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等，而是得去找这个句子，找它出自哪首唐诗，这样就逼着学生有更宽的视野。

师者范也，师不一定高过学生，但是师要提供示范，就是透过老师的性情、个性、情怀去影响学生。学生在老师这里学到最多的其实不是知识，因为知识永远学不完，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但是可以透过他的性情和魅力，让学生感受到老师身上的力量 and 美德，这是在传递价值。



民国清真第二小学开学典礼

课外之美：释放天性，艺术滋养

民国教育非常重视让孩子参与表演。话剧是很训练人的一件事，表演让一个人能够代入，一个人的天分能够充分发挥，一个人的创造能力、反应能力、联想能力、应变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都可以得到全方位的训练。

镇海一所小学的科学老师江圣泗先生给孩子排的科幻剧《火星人》，其中出现了激光、人工造雨、基因工程、可视电话、改造沙漠、无土栽培，这些现在都已经实现了，但在 1936 年的中国只是科幻、想象。这一部科幻剧演下来，让学生对科学、农业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通过一次戏剧表演就能够把孩子带进这个世界，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是知识进步的源泉。”

周恩来当年在南开中学的话剧舞台上以男扮女装出名，他在政治上的长袖善舞、身段柔软，是否与早年的历练有某种不可分的关系呢？南开的话剧舞台还成就了曹禺，他 24 岁就写出《雷雨》，自然与他中学时代常常参与话剧表演分不开。那时候很多学校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学生在课余有很多精力放在排戏上，话剧舞台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拓展了学生的世界。

一个人的格局尺度，往往是中小学时代奠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小学决定着人的一生，如果中小学时代的尺度还没有变大，那么未来的尺度就很难再变大，因为前面给他提供的模子太小了。我认为，大学教育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时候一个人的个性、格局甚至价值观往往已经定型了，最关键的是，人的趣味已经定型了。



民国小学生

民国的教育理念还蕴藏在校歌里，从校歌可以窥见当时教育者的担当。朱自清用半文言为温州中学写的校歌，传唱 90 多年也不觉得过时，歌词中不仅概括了温州的山水，也传递了学校要提供的价值，“东西学艺”与“上下古今”，倡导的都是开放的启蒙价值。

当年中央大学附属小学的校歌，“钟山壮，长江长，我们的学校在中央”，一语双关，不仅是中央大学的附属小学，而且它的位置就在南京的中央，但最后它要传递的却是一个朴素平凡的价值，“我们在

这乐园里努力准备，我们在这乐园里快乐安祥”。

很多校歌都很简单，比如德清莫干小学的校歌里唱的：“勤俭忠慎，我校之箴。耕不废读，读不废耕”，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对待世界，进可以问鼎天下，退可以耕种田园，一个人永远都不会失落，因为总有一个可以去应对一切的精神世界。能提供这样的价值观，才是好的教育。

那个时代的校歌，几乎都是从看得见的山水开始，归结于学校到底要传递什么价值。上海位育中小学的也一样，“黄浦江水洋洋，大小学生聚一堂”，但是最后传递的是“爱我国，爱我校，爱我先生，爱我同窗”，如此亲切、接地气，说明校歌是有生命力的。歌里唱到的“创造，创造，生长，生长”，就是位育学校要传递的核心价值。人不是被修剪出来的，而是要自己生长的。



北平西北小学全体师生合影，摄于1931年

教育不是流水线式的工业,可以批量生产没有生命的产品;教育是种庄稼的农业,要收获有生命的果实。教育要面对活生生的孩子,他们各有性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无限可能性。

教育就是与美相遇。生命与生命的相遇是美的,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自我的相遇都是美的,每个人通过阅读与古今中外的生命相遇也是美的。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拓展一个更宽阔的世界,让你的世界变得更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就是要让人成为一个新人、一个美人。“美人”不是指长得漂亮,而是指成为知识、心灵和行为上的美人。美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美可以穿越时间,唯有美的价值是恒久不变的,真正的教育最终都要通向这个目标,即在变化的时间中寻找确定不变的价值。 ■

[【返回目录】](#)

何光沪：为李勇“花开见佛”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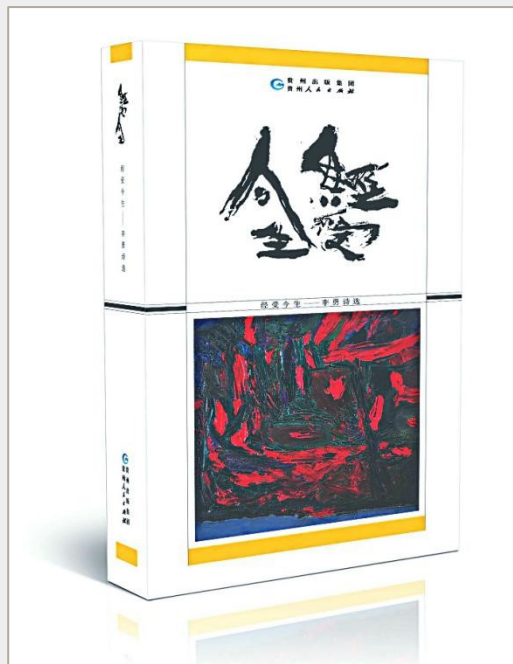
[何光沪 著名宗教哲学家，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在人的种种品质中，我最看重真诚。我想，写东西让人看，正如说话让人听，第一需要的也是真诚。所以，写作一如说话，要说真话，要真心地写出真实。

我同李勇一共见过三次，说实话，不是很熟悉——第一次他一边开车一边讲他的奇异经历，第二次没有机会交流，第三次才听他讲了一些诗画的背景。再加上我对于诗歌和绘画，既无研究，又只喜欢古典诗歌古典绘画（不论中西，音乐亦然），所以说实话，他一再请我为他的这本书写点东西，我颇为难。

那么，为什么还是写呢？正如另一些为他写序或在《经受今生》里写了文章的学者或画家所说，是因为他的真诚——不但表现在言谈中，也表现在诗画中的真诚！

那么，写什么呢？



贵州籍诗人、画家李勇 著《经受今生》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 年 1 月出版

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收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入藏证书》

关于他的诗画，说实话，我只能说：我觉得他有很好的感受或天赋，希望他还能扎实地学习，向自然学习，向古典大师学习，学语言、学技法；希望他还能认真地琢磨，磨掉瑕疵，磨出光泽，然后发表，才能对人有益，不负天恩！

我还可以说，也应该说的，是宗教信仰。



《经受今生》一书的作者李勇

一来是我觉得，李勇最初知道我也愿同我交往，是因为知道我的专业是宗教学，而他又真心诚意地对宗教信仰有兴趣，表示想听听我从专业角度说说宗教；二来是李勇明确地请我，把听他介绍献给海子的“第一幅国画”时聊天的话，写下来收进他的书，而我的聊天说到了宗教——当时我信口说，画上写意的横线条似乎能看成汉文“天”字，纵线条似乎能看成“了”字；“天”即老天，即中国古书所言上帝，“了”即了结或完结，或可暗示海子之死；上下连接也可暗示天人相通……说到“完结”，我给他介绍了被纳粹处死的神学家朋霍费尔临终之言：“这仅仅是（生命的）开始”……他说画上那一点表示海子，我说那有点儿像蝌蚪，如果是蝌蚪就多了点意思：它的死亡是新生命即青蛙的开始，正如宗教哲学的“维度”之说——有人问：“基督教讲人死后复活接受审判，义人永生，地面上那么多人，怎么挤得下呀？”此说这样回答：“如果一块地面顶多能挤一千只小虫子，它们多半不知道，它们的死亡是新生命即它们变成的飞蛾的开始，而那一块地面加上第三维度即向空中伸展，能容纳多少倍的飞蛾呢？”所以，宗教哲学可以打开我们在思想上的视野，进入第五（时间是第四）或更多的维度。

李勇在宗教上的视野还是开阔的，他真诚地谈到了去成都参加基督教会聚会受到的感动，对那些正在经受磨难的基督徒流露出真切的情感；他还送给我两本那个教会编的小书，让我了解那个事件的真相。因此，尽管他这本书有此标题，我相信他对我的以下实话会有真诚的思考。

德国大诗人歌德曾说，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是上帝，这同“郁郁黄花莫非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和此书标题，从宗教学上说，都属于泛神论；另外，世界宗教学界多认为释迦牟尼反对婆罗门教，并不主张有神论，反而主张无神论；再者，大众部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少在民众的实践中已经成了多神教，事实上大量多神教徒的信仰态度是功利的、世俗的或近乎迷信的。这一点事实众所周知，或许李勇也了解。

但是，下面这几点就不那么众所周知了：第一，尽管天主教官方曾经否定泛神论，但是从古到今，许多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在内的）神学家都论证了一种辩证的理论，即上帝既超越于一切又内在于一切，这就包容甚至超越了泛神论；第二，一般学者认为无神论不是宗教，而且是与宗教对立的（我觉得原始佛教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哲学或心理学）；第三，已知的中国最古老的信仰，是对独一上帝的信仰（甲骨文和《诗经》、《书经》，也称为“帝”或“天”），而不是无神论。至于多神论的产生，相对较晚，而且在中国国情下的腐化，是今日犹甚的事实。另外，从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直至今日的许多事实表明，并非所有的宗教都有益于道德。

总之，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不否定理性的。信仰者应该运用理性，防止陷入迷信。说到底，信仰是最大的“人生大事”，在这个文化和宗教多元并存的时代，其实是应该多看、多听、多读、多思，然后才作决定的。

我相信，李勇不仅会真诚待人，也会真诚对己。“不诚无物”，诚实的灵，是最重要的。 🍷

2018年8月4日-6日于贵阳

[【返回目录】](#)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年3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年3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干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年4月,「**铁路改制: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年9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年10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2015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二. 众筹方案

2018-2019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1. 众筹目标: 3万元 (2018-2019年度4-5场沙龙的总经费)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3. 众筹回报：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每期沙龙仅一位）：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全年仅一位）：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861581962310001**（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wistom113@163.com, 13717696284。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2018-2019 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订阅 | 往期下载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nGlllI-5ehNtyrler9dKw> 密码: t9ed